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2月28日第4期 总第21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14期

北京高校文革专辑（十七）

目录

【编者的话】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抓紧大中专院校文革史的编写

【罗文胡注】

罗征启 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二）：昙花一现八百天

——1966年10月至1968年底的清华的文革动乱

胡鹏池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第二章评注

附件一：群友：关于“历史真实性”的讨论

附件二：胡鹏池随笔：周恩来批评四一四的两句话

附件三：胡鹏池随笔：你也有今天！

——评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在清华“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发言

【述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二）——扬威苏联大使馆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五）——沙洋千校

【文摘】

郭影秋 我认识的康生是个什么样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节选（下）

【封面】

邹行 枯木之眼

【本刊声明】

【编者的话】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抓紧大中专院校文革史的编写

如果从1978年算起，文革研究至今整四十年了。四十年中，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上层政治和群众运动。在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上层政治的研究难以有新的突破。而群众运动的研究如果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也难以深入。这就需要我们调整方向，把目光转向省区市县和基层单位。档案开放与否，对这种研究影响不大。

一年前，本刊曾以《家有三件事，先从紧上来》为题，吁请大家把目光转向地方文革。（见《记忆》第181期，编者的话）。学校文革史，尤其是北京的中学和大学的文化史同样是“家里”的要紧之事。

文革最早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是文革主体阶段的主力军。他们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把真相和教训留给后人。北京是文革的策源地，清华附中、师大女附中、四中、八中等中学，北大、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北航、人大等高校，是当年斗批改的先锋队，是造反信息的发射塔。今天，它们也应该成为编写本校文革史的前驱和带头人。

十年来，有些学校已经在澄清史实、积累资料、总结经验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可以从《记忆》的专辑中看出来。迄今为止，《记忆》出了10期北大专辑；¹6期师大女附中专辑；²3期北京四中专辑；³3期北师大专辑；⁴3期地院专辑；⁵2期人大专辑；⁶和2期

¹ 这10期是第114、120、132、133、139、143、147、152、155、159期。

² 这6期是第47、49、80、106、108、112期。

³ 这3期是第52、72、88期。

⁴ 这3期是第150、154、158期。

⁵ 这3期是第145、151、157期。

⁶ 这2期是第202、203期。

清华专辑。¹从2016年7月开始,《记忆》将北京高校合为一体,至2017年12月,又推出了17期“北京高校文革专辑”。²算下来,北京的中学和大学共出了46期,占《记忆》现刊发总数(214期)的四分之一,近三百万字。

在上述学校中,走在前面,做得最好的中学是师大女附中。这个学校的老三届或孤军深入,或团队合作,数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矢志以求,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她们自印的三大本《岁月女附中丛书》和三大本《史料文存》。为研究十七年的“红色教育”,探索校园暴力的源头、贯彻阶级路线的危害等提供了深入的思考和宝贵的资料。

在大学中,清华大学行动得最早,成果最多,研究最深入。北京大学紧步清华后尘,虽两派各执一端,但通过争论,澄清了事实,激发了北大人的热情。《燕园风云录》已经出了四本,聂元梓回忆录的修订版《我在文革旋涡中》问世,《北大文革大事记》初稿已成。地质学院、北师大、人大亦不遑多让,后来居上。

经历过文革的中学老三届生于五十年代,现已六十开外,将近古稀;大学老五届生于四十年代,现已超过七十,渐入八旬。再过十年,这些亲历者还有几人能写本校的文革史?时不我予,今后的十年是我们为世间留下真话的最重要的十年。

罗征启有言:“我们要把这段历史留下。如果整个民族失忆了,或者连我们这些当时人、当事人都没有留下点亲身经历的记录,那么后人又何以为鉴呢?”“十年浩劫”已经改成了“艰辛探索”,几代人的青春热血,无数同胞的生命就在这轻轻的修改之中被摒蔽。亲戚朋友们劝你:“折腾半生,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安稳日子,还想那些事干吗!”老伴孩子怨你:“写那些陈糠烂谷子干吗?国内没法出版,外头出了又带不进来!”

恶与强权笑了——他们正盼着文革的亲历者忘光光,死光光呢! ■

2018-2-27

¹ 这2期是第59、60期。

² 这16期是第161、164、170、172、174、175、176、182、165、190、193、196、202、203、207、208期。

【罗文胡注】

清华文革亲历记（二）

昙花一现八百天[注 01]

——1966年10月至1968年底的清华的文革动乱

罗征启

本篇目录：

没有历史，何以为鉴

盘根错节、顷刻瓦解

红卫兵“勤王”乱政，蒯大富趁乱夺权

两派争论始于“彻底砸烂”和“什么彻底砸烂”

《四一四思潮必胜》功不可没

评注与附件：

附件一：群友：关于“历史真实性”的讨论

附件二：胡鹏池随笔：周恩来批评四一四的两句话

附件三：胡鹏池随笔：你也有今天！

——评 1967 年 4 月 10 日蒯大富在清华“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发言

一提起清华的“文革岁月”。人们就一定会想起蒯大富，自然也就想起清华园的“百日武斗”。其实，文革十年，蒯大富在清华掌权只不过两年多，大约八百天。[注 02]但是不仅在清华园，在全国，他都是很有影响的角色，他是文革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是出头露面的急先锋。也许到文革晚期，我们大家和他自己才明白，他只不过是被利用来冲锋陷阵，搅乱政局，打击既定目标的马前卒，和最后承担罪责的替罪羊

而已。[注 03]

美国作家韩丁先生写了一本著作《百日战争》，[注 04]主要是介绍从 1968 年 4 月 23 日电机馆攻防战开始，到 7 月 27 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为止的一百天中，[注 05]发生在清华园的“团”与“414”两派的斗争。其实，“武斗”，或者“战争”，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总会有前因后果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也需要有发生的土壤和气候。这一点，韩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讲，至少并没有讲清楚。但是他的这本著作却是第一本描写清华文革的著作，贡献是重要的。如果说他还有些问题没有讲，或没有讲清楚，那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时机不成熟，或政治气候不允许。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时机成熟了吗？政治气候允许了吗？我认为，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华园的大混乱，罪魁祸首是谁？难道是蒯大富吗？

1980 年暑假，我奉命到中央党校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注 06]清华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亲自送我去报到。他的夫人汪琼是我所在学习班的班主任。他家就在中央党校大院内。一天，我去拜访两位老人家，刚好看到刘达在家门口发脾气。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了两部车，一位副局长来请刘达在正式逮捕蒯大富的逮捕证上签字。刘达大骂吴德：

“你市长不签，哪有叫我当校长的签逮捕证的，我不签！”公安局的人说，吴德讲了，逮捕蒯大富是邓小平的指示，你回来传达的，我们没有见到文件或邓小平的手令，只好请你签字。刘达想了想说：“这点事都不敢担当，还当什么市长！签就签吧！”[注 07]

两年之后，刚好我又去刘达家里请示工作，刘达的秘书，王乐铭与我同去的。正好又见到刘达接个电话在大发脾气。说蒯大富被判了十七年徒刑，但是法院要从 1970 年算起。1970 年，蒯大富被送到北京西郊东方红炼油厂隔离审查，跟班劳动，不许离厂。刘达说：“他有啤酒喝，有鸡蛋吃，他是在休养，哪里是审查？正式逮捕令是我签的，应该从 1980 年正式逮捕时算起。十七年太少了。我认为应该让他们过了六十岁才出来。他们是一群疯子，他们的能量是很大的。他们出狱之后，很快就能上去，我们还得倒霉！”

这时，王乐铭说：“刘达同志，就按法院的意见办吧。”我接着说：“1970年以后，他到底是没有自由了，不能随便走动，也是受到惩罚了。”刘达满脸怒气，正言厉色的说：“人说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你罗征启疮疤还没好就忘了疼，我就不同意你把杀死你弟弟的那个学生放了。我正好出国不在家，我如果在，我就不同意你这样做。我再说一遍，他们是一群疯子，搞乱了我们的国家，不能宽恕他们！”我看着刘达，慢慢地说：“刘达同志，我们好端端的一个共产党，好端端的一个共和国，又是谁给搞乱的，是蒯大富吗？他有这么大能量吗？刘达一时语塞，瞪着我半天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刘达似乎气已消释。

过了一会，法院的车到了。刘达没说什么，不声不响地签了字。[注 08]

于是，蒯大富和少数几个有血债的学生被定了罪，判了刑。似乎，至少清华园那段历史已经解决了，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实则未必。武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两派的政治和武斗是什么政治的继续？表面看，两派都忠于毛主席，都坚决贯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两派都叫井冈山，都“打倒刘少奇”，都反对“二月逆流”，都“批林批孔”，伟大领袖指到哪里，两派就立即打到哪里。两派都抓人，从冷兵器到热武器都用。似乎分歧只是到了7月27日，一派用长矛步枪、手榴弹镇压[注 09]手无寸铁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员，而另一派则立即缴枪，拆除工事，听从救命恩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指挥和安排。[注 10]难道727两派截然不同的表现，就不是政治的继续了吗？这是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一定要解答的问题。[注 11]

没有历史，何以为鉴？

首先，我要说明，虽然在清华文革混乱的十年里，我处在“风口浪尖”上，几起几伏，大起大落，侥幸活下来。与我有关联或直接因我的牵连而死的就有好几个人。[注 12]但由于我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我所知道的也只是一麟半爪，并不了解全面的情况。手头上也无任何资料可查。我看到现在有许多人在写“回忆录”、“纪实”、“亲历记”等等。他们

贡献出自己的日记、札记、照片，查阅当年的报刊、文件或私人的笔记，整理出大本大本的“大事记”。我敬佩和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他们提供的资料，使得我可以查阅核对，找回我的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可能是残缺不全和支离破碎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段历史留下。如果整个民族失忆了，或者连我们这些当时人、当事人都没有留下点亲身经历的记录，那么后人又何以为鉴呢？

文革中，我在清华的“家”（其实就是宿舍——荷花池第一宿舍）和我父母在北京的家，都多次被抄。最后，我所有的书籍、信件、手稿、文件、照片等等几乎全部被一扫光。甚至把我和妻子的通信也抄成大字报张贴示众！这实在难以容忍。当时我曾经发誓：今后再也不写笔记、日记，不留任何个人的生活、学习和思想的蛛丝马迹。于是，今天我就只能靠记忆。这样当然就难免有不准确。

比如说，蒯大富的人到北京站我父母的家中绑架我的日子。现在，所有的记载都说是1月30号。称为“1.30事件”。直到最后，我自己在回忆此事时，也还说是“1.30”。我们全家人都记得这一天是农历年三十。我记得我带女儿回到我父母的家，我母亲问：“回来干什么，有没有危险呀！”我说：“年三十越南和美军都停战呢，我们打派战不至于比越南前线还紧张吧！”然而，我的“专案组”负责人孙耘却说那天是年初一，他正在天津，接到通知，说抓到罗征启了。我查对过日历，的确是年初一。

又如我自三堡疗养所成功跳楼越狱之事，我的记忆一直是3月27日凌晨。在原蜀育、邱心伟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上说：“3月27日——凌晨，罗征启不堪受折磨，跳楼逃出关押点三堡——。”但我仔细排演当日的细节，发现从我逃出三堡到被解救回到科学馆，这中间少了一天，可能正确的时间是3月27日深夜，即3月28日凌晨。

陆小宝同学为唐金鹤同学的《倒下的英才》所作的序，写得非常好。他认为唐金鹤作为一个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是：有所不言，言必由实。事事都得有可靠的事实根据。不能模棱两可，更不可臆造发挥。他认为：“任何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有真实的细节组成的，

凡是事实，都有核查的价值。任何事情，只要说的是事实，就富有历史的意义。”这讲得很好，但是我得补充一句：“事实”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

同一事物我从左边看，它偏右，你从右边看，它偏左，都是事实。但是个人感觉，可能不同。你我一起都从正中看，他不偏了。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面，那另一面如何？不知道。因此，我们不能说，我是绝对真实的。[注 13]比如在已完稿并印刷出版的一些“纪实”、“大事记”等等，总的说来都是“真实”的，都是非常负责的工程师之作。但是我看到关于我本人的一些文字，则尚有错漏缺失。

所以，我决定不写“回忆录”，不写“历史实录”，尤其不去挑别人的错，去辩论谁是谁非，谁不真实，或谁更真实。工程学和社会学的真实是很不同的。工程师们为社会学的一些问题争论，其实大可不必。用工程师的眼光去观察社会上发生的事和变化，常常是看不清的，因为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我只想记下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思考、胡思乱想，甚至是我的梦幻，我肯定是负责的。但有些细节，如发生的时间、地点、条件、有关联的人物等等，则未必都非常准确。我会认真听取所有人的批评，但我不解释、不辩论，有错一定核实改正，欢迎大家批评、斧正。[注 14]

盘根错节、顷刻瓦解

1966年7月，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引发全国开始大乱之前，他却“才饮长沙水”，又到武汉“食武昌鱼”，在“畅游长江”之前（即1966年7月8日），从武汉给正在上海的江青写了一封信。尽管现在一些知情人认定，这封信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代笔，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文风，是他认可的，以他的名义下发的。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隐晦，意图深不可测，似乎透露了他关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又是一场阴谋，非常恐怖。但这封信的内容是很久以后才公诸于众的。

信中关于北大、清华的几句话是这样写的：“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这

就像布的一道咒语，把北大、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套牢了，把清华、北大十年大动乱的整体轮廓描绘得清清楚楚，一切都在“伟大领袖”的掌控之中。

当时，我们只知道，十多年来，清华由蒋南翔领导的党委，苦心经营，建成一部“不漏气的发动机”。清华一直被认为是一贯正确的，牢不可破的堡垒，确实是“盘根错节”的。但是1966年6月的两篇社论，一篇大字报，一个工作组，堡垒就“顷刻瓦解”了。

“蒋南翔党委”瓦解之后，以王光美为主的工作组，又带着一些高干子弟在清华掌了几天权，还没有来得及“盘”、“错”好，就顷刻瓦解了。然后经过短期的争论混战，蒯大富夺权上台。前党委已经“彻底砸烂”了，蒯大富又“盘根错节”起来。清华园经过百日武斗，用了真刀、真枪，真炸药。到7.27两三天功夫，蒯大富又顷刻瓦解了。

然后，迟群、谢静宜又盘根错节起来。他们也和蒯大富一样，都有毛泽东的公开和半公开的支持。他们手中有圣旨、圣谕，有芒果，也有尚方宝剑，连中央文革和毛泽东本人都“盘”、“错”在其中，但还是“顷刻瓦解”了。毛泽东布的这个咒语，在他弃世之后，才被解开扔掉了。

不仅清华园里的厮杀争战，而且全国范围的大混乱，在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似乎都定了调子：“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外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全国各地，两派都高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冲锋陷阵，拼死搏斗。他们受伤了，残废了或死掉了，他们能叫烈士吗？他们打赢了，或者顶住了，没垮下来，又能叫胜利者吗，要盘根错节，还要顷刻瓦解，而且还要“七、八年来一次”，“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不正是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真实写照吗？

红卫兵“勤王”乱政，蒯大富趁乱夺权

这是一出悲剧，一出闹剧，也是一出荒诞的恶作剧。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如果他还在世，他会说什么呢？恐怕仍会像57年错划这么多右派分子，59、60、61年饿死四千多万人那样，说成是成绩是主要的，斗争是必要的、及时的，形势是大好的等“三七开”之类的话。但是我们从他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来看，还是端倪可见的。尤其他给江青的那封信，意图更加明显。

在清华园，工作组“顷刻瓦解”了。由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组成的临时革委会，[注15]也不声不响地烟消云散了。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这时全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北京天安门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接见百万红卫兵的闹剧，“破四旧”造成了大破坏刚闭幕，又换演“大串联”造成的大浪费。

清华园内每日接待数以千计，各地来京的串联群众。刚刚建好尚未正式启用的主楼，开放接待红卫兵。霎时间主楼的门、窗、五金件等被盗拆一空。作为原校领导办公用的工字厅也开放接待。当时工字厅没有暖气，只烧煤炉，我们这些“黑帮劳改队”多被分配去管理烧煤炭，要二十四小时保持旺火，保证室内温度高过二十度，要使睡在水泥地上的“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感到舒适温暖。夜里要加三次煤，“黑帮劳改队”要日夜排班保证供暖。

我们看见这些“毛主席的客人”真是大丰收，有的人走时竟用枕头套当口袋，装走两三袋馒头。

我的妻子梁鸿文和建筑系的一位教师一起被分配在主楼接待站服务。有一天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问我，你知道“烽火戏诸侯”这个典故吗？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正想到这个故事。我估计鸿文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她一定是从建筑系老师那里听来的，更不会理解谈论这个故事的危险性。我对她说：“你注意点，这事千万不要再说了，别人说就当没听见，别答，走开好了。”她追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章回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第二回讲的故事，题目是“幽王烽火戏诸侯”。

她还追问是怎么回事，我于是告诉她，西周末代君王是周幽王，非常宠爱一个褒国的女子，姓褒，史书称褒姒。但是这个女子从来不笑。幽王于是悬赏，有能使褒姒笑的人，定受重赏。有个大臣就出了一个馊主意：让幽王下令击鼓举烽火。诸侯听鼓声见烽火，以

为王室有难，纷纷驰兵来救（这在古时候叫“勤王”）。到了都城，不见有敌寇入侵，只见幽王与褒姒正在城楼上饮酒作乐，诸侯才知道上当受骗，而褒姒果然笑了。后来西戎真的入侵时，虽然多次击鼓举烽火，诸侯都不来救，结果幽王人死国亡。

在一次次接见红卫兵，耸人听闻地说身边有个赫鲁晓夫，又让江青上台出镜的时候，谁议论这个故事，很明显是非常危险的。后来，我知道清华有的师生就是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的。

可以不准大家讲，但是不可以不准大家想。[注 16]几百万红卫兵一批又一批到北京来，是为了观赏北京的名胜古迹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勤王”。因为伟大领袖击鼓举烽火，说身边睡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于是大家都是来誓死捍卫领袖的。在北京，经过领袖接见，经历几百万人山呼万岁那震撼人的场面，加足了油，打足了的气，回去好造反。于是全国大乱，几乎所有的开国功臣，老干部，甚至被誉为领袖的亲密战友的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一个一个地被打倒了。

刘少奇是死定了。可谁来操刀？谁来开炮？谁当先锋？谁来喊出第一声“打倒刘少奇”？——蒯大富受命出场了。

将近四十年后的一天，我和唐伟等几个人陪同清华来的专门研究并在撰写清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唐少杰老师一起与蒯大富座谈。[注 17]我说：“老蒯，咱们今天不要老生常谈了，谈点我们不知道的，或者你没说过的。”老蒯一口答应。不知是谁提了个问题：“就说到底是谁给你平反的？谁把你捧到学生领袖的位置上的？过去，我们听说和猜测的什么都有，有的说是中央文革，陈伯达，戚本禹，或者江青等等，但是都没有能解开一个谜团，就是你蒯大富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横冲直撞，甚至连周总理都不在话下，难道——？”

蒯大富的回答语惊四座：“是毛主席，是主席叫周恩来到清华甲所单独和我谈的。——”

工作组通知他到甲所，说有人要找他谈话。等到半夜，只见来的是自己想也想不到、

也不敢想的周总理。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来找你谈话的-----。” [注 18]

接下去，工作组撤走了，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临时筹委会也散架了。蒯大富乘乱夺了清华大学的行政大权。接着建立了井冈山兵团，兵团总部下令清华的党员到井冈山的总部去登记，遭到党员的抵制，没有结果。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搞了一个“12.25”行动，拉上几千人上街，在北京，也就是在全国，第一个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贴出了第一张点名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

我曾问蒯大富，“12.25”行动，是不是有人叫你这样做的？他说：“没有，真的没有。当时的情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不干，也会有别人出来干的。” [注 19]我想，这是真的，这就叫“落实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吧！

两派争论始于“彻底砸烂”和“什么彻底砸烂”

“彻底砸烂”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在清华，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已经无可考证。但是，蒯大富无疑是代表人物。他可把这个口号叫响了，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要彻底砸烂，所以引出两个估计，第一是建国后到文革前，我们的国家是红线主导的还是黑线主导的？第二是我们的干部队伍，大多数是好的，还是大多数已经烂掉了？对于蒯大富来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当然都是后者了。而且很明显，中央文革，乃至毛泽东本人，实际上都是支持和力行“彻底砸烂”的。最高领导虽没有明确地喊出这个口号，[注 20]却放纵、利用这些红卫兵去冲冲杀杀、乱斗乱批，到一定时候（1968年7月27日）再来收拾这批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乱党乱国的罪责却要这批年轻人来承担。

在清华，有几千人明确反对“彻底砸烂”（还有不少人不敢明确表态反对，但实际内心是倾向反对的），其代表人物和领袖就是沈如槐。

和蒯大富一样，沈如槐也来自苏北的贫困农村。能考上清华大学已很不易，现在能在文革乱军之中，举起大旗，成为清华、甚至全国的反对蒯大富的学生领袖人物，更是不简

单了。我认为沈如槐比蒯大富更精彩。这不是因为沈如槐是党员，而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任何“后台”，却能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到最后。甚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批评、不满，也没有能使沈如槐退缩或垮下来。在“727”蒯大富下令开枪，武装抗拒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清华制止武斗之后，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和批评五大学生领袖时，还不忘记捎带骂了立即交出武器、拆除工事的“414”几句。[注 21]这样明显的偏心和拉一派打一派，可以想象给沈如槐造成的压力有多么大。

文革之后我和一些“414”的战友，时时回顾在那十年大动乱中，蒯大富有强硬的后台，可以有恃无恐，走错了路，而沈如槐没有后台，却成就为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的学生领袖人物，真不容易啊！

一九六七年，当“彻底砸烂”甚嚣尘上的时候，沈如槐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反驳“彻底砸烂”论，题目是“什么‘彻底砸烂’？”大字报一出，各种议论都来了。即使“414”内部，也不尽一致。有人说，这题目不醒目，不针锋相对。当时我曾和原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原党办副主任饶慰慈一起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命题非常聪明睿智：第一，不当和“彻底砸烂”论针锋相对，“砸烂”的对立面是“保护”，这样就自投“保皇”的陷阱了。第二，在当时的辩论中反对“彻底砸烂”的论据是红线主导，而把建国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反右”、“三面红旗”等都说成是“红线”，这在当时我们心中的疑虑甚多。第三，“彻底砸烂”这个杀气腾腾的口号，明显是倾向于暴力的，这也是“414”所反对的。然而，用一个什么样的命题能够把这三个方面内容涵盖进去呢？

沈如槐很聪明，用《什么“彻底砸烂”？》为标题，问你蒯大富，你要砸烂什么，怎样砸，你的目标，你的方法，请你自己说清楚吧！

文学宓还告诉我，他曾参加过几次“414”总部的会议。（我们几个干部，除文学宓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以外，其他几人出身都不好，所以我们都怕给“414”引来麻烦。因此都不出头露面，只推文学宓去参加“414”的活动。）他说沈如槐、汲鹏、宿长忠、陈楚三、孙怒涛等总部头头，都思想敏锐，品德好，敢于承担，讲话逻辑严密，很有煽动性，将来

都是将帅之才。很可惜，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荒诞的大革命中，虽然沈如槐和他的战友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一直坚持正确的方向、方针和策略，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注 22]但是终究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实何止是“414”的这些头头，“团派”的头头们，哪个不是将帅之才呢？虽然大家现在都成熟了，但终究，时过境迁，都已年逾花甲，时不我待了。

六十年代反修防修学习时，有一条语录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无政府主义也是机会主义，谁又来惩罚它呢？，蒯大富的“彻底砸烂”是很彻底的，最后已经砸烂了他自己。这是惩罚吧？

《四一四思潮必胜》功不可没

1967年4月，在长期争论之后，井冈山兵团总部终于渐渐分化，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工程化学系69届学生蒯大富为首的“团派”，骨干都是曾经反对工作组、受到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压制的学生。其核心战斗组是以林彪指挥的“28团”命名，故自称或被称为“团派”、“老团儿”。另一派是以数力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的“414总部”自称及被称为“老四”或“414”。

“团派”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支持，很“牛”，是清华园的主流派，是掌权的、强势的和比较激进的一派。“414”是1967年4月14日正式从井冈山兵团总部分裂出来的。但出自策略上的考虑，还叫井冈山兵团，不过改称“414总部”，是在野的、比较温和的一派。当时学校大部分党团干部和许多教师都是倾向或支持“414”的，我也支持“414”。

刚开始两派争论是漫无头绪的，似乎只是权力之争，[注 23]争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争将要成立的革委会的席位。不仅清华，看全国各地，各高等院校大都如此。有所谓“天派”、“地派”之争。实际上有些人自己也弄不清是哪一派的。北航“红旗”应

该是“天派”的。第一把手韩爱晶经常同蒯大富争论，韩经常当众说他赞同“414”的许多观点。

但是逐渐地、清华的两派争论脱颖而出，演变并上升为有明确理论根据的思潮之争。

“团派”那边的情况我不知道，“414”这边有许多干部群众已经在紧张地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寻找理论根据。

1967年7月中旬，两位支持“414”的政治课老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我，汽6班学生周泉纓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四一四思潮必胜》（后简称《必胜》）。文章很有新意，但比较粗躁，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我请了李兆汉、万润南和孙敦恒三个人和我一起进行修改。

李兆汉是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思想敏锐，笔锋犀利，尤其擅长写辩论文章。我在建筑系任团总支书记时，他是政治辅导员。后随我调到党委宣传部，一直在和我在同一单位工作，是同事、战友。

万润南是建工系给0的学生，文艺社团集中住宿的文艺社的成员。文艺社的支部书记印甫盛有时会带万润南去我家闲聊，我们叫他“阿南”。1965年0字班学生到部队当兵，又是我带队，当政委。团长及排以上干部正职由部队派干部担任，副职由校方派人担任。团长给我派了个勤务兵，刚好就派了阿南。我问他“谁派你来的”？他说，“报告首长，我们排长派我来的。”“派你来干什么？”他微笑着答“报告首长，排长说第一当好首长的通讯员；第二，给首长打洗脚水；第三，-----”当兵返校后，文艺社团党支部组织委员找我商量，让我当阿南的入党介绍人，我同意了。经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后，按规定介绍人要跟入党对象正式谈话，这就引出了万润南在他的《清华岁月》里讲到的：我约他到我的宿舍去谈话。他说我并没有讲什么共产主义的大道理，只是放了一曲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用唱片当伴奏，拉了一段小提琴。这次入党谈话，只是启蒙了对莫扎特音乐的欣赏和理解。后来，有一次他打长途电话来祝贺节日，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入党谈话怎么可能一点共产主义的大道理都没讲，只拉了一段小提琴？难怪有人看了你这段回忆对我说，

你可能本来就是另类的党员，开除你出党是迟早的事。”他大笑说：“我确实只记得那段音乐了，要不这样，罗老师，你说你当时讲的什么大道理？”我只好挂免战牌了。

他们是我的学生，非常尊敬我。但是，在许多方面，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在荒唐迷乱的十年当中，有许多问题，由于过去的经历，我曾陷入极度的迷惘混乱之中，是他们——不只是他们两个人，还有许多比我年轻很多的学生，“开导”了我。当然他们两人是离我最近，对我最了解，使我得益最多的学生。他们两个，老印是咄咄逼人，思维敏捷，逻辑缜密。阿南则是文笔轻松，但又有足够的分量，而且藏锋不露，幽默潇洒。老印的特点是想人所不敢想，说人所不敢说。而阿南则是想人所没有想，说人所没有说。我没有见他们两人争论过，我记得他们也没有跟我争论过。这次我叫阿南来帮我写东西肯定也请过老印。但为何这次就没有老印，我记不得其中的细节了。

孙敦恒是校刊的编辑、政治课的教师。他不大讲话，但是如有不同意见，他会直率、中肯地提出来，是个忠实可靠的第一读者。

就这样，四条汉子，开始修改《必胜》，地点是在学生宿舍一号楼一楼的一个大房间。第一次修改讨论会，作者周泉纓也参加了。但他主要是听，很少说话。

我们很快研究了《必胜》这篇文章，并取得共识：认为这篇文章的确有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章通过对河南“二七公社”和“河造总”的分歧与清华的“团派”和“414”的分歧的分析，说明大学和社会上的争论及分歧一定是中央内部矛盾的反映，与中央内部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是密切相关的。现在大学和社会上这样混乱，中央绝不可能平静。但中央的极左派不敢挑明自己的观点和公开暴露自己的面目，而让蒯大富出面。蒯大富只是个傀儡，将来是要倒霉的。文章应该针对蒯大富的“彻底砸烂”理论。这是有清华和蒯大富特点的理论。周泉纓说，中央文革是个大杂烩，他们拿不出或者不敢亮出像样的、系统的、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还需要我们在和蒯大富的争论中厘定，说清楚。

第二，文章认为全国各地、各大专院校虽然各种思潮都在表演，百家争鸣，争论很激

烈，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以蒯大富即“团派”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将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说成是黑线主导的，是要“彻底砸烂”的。这一派当时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撑腰和支持。而另一种是以“414”为代表的比较温和、也比较实际的思潮。这一派没有后台，处境很困难。这样就把清华及全国看似混乱的“派性”争论，上升到了思潮甚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向、前途等原则的、理论的分析这一层次上了。这也是《必胜》这篇文章的一大功劳。

第三，文章还指出：“团派”思潮因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而且有中央文革以至于最高领袖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很有可能取得一时的胜利，能掌权。但掌权以后必然要乱，是不可能长久、稳定掌权的。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批判《必胜》关于“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要害”。

其实，经过和周泉纓多次讨论，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词，就是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因此，虽然《必胜》文中并没有明写，但毛泽东和张春桥多次说：《必胜》“是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四一四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他们是很敏感的。[注 24]

然而，毛泽东虽然多次批评《四一四思潮必胜》，但他始终没有把“414思潮”定性为“反动思潮”，使得“414”能存活下来，没有垮掉。为什么是这样，这始终是“414人”的一个不解之谜。

我们还决定，文章在修改时尽量保留原文的大框架，不要改动太多。原文的风格应尽量保存。原文共分四大段，我们分了工，阿南一段，李兆汉一段，我两段。李还负责找有关的马克思、列宁的语录。我还负责研究和处理那些太露骨、容易让对方抓住小辫子及易引起中间群众动摇不安的文字和内容。规定了交稿时间，最后由我统筹修改。

后来李兆汉找到了一些很合适的语录，作为文章的理论依据，增加了理论色彩。阿南偷懒，说是都交给我统一改好，需要的话他再上手。[注 25]

周泉纓很急，我们刚把稿子顺了一遍，他就拿走了，当晚就请文工团的几位干部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立刻引起了很大震动。

几天之后，《必胜》被团派大批特批，上纲越来越高。尤其是他们知道毛泽东也批判这篇这张大字报之后，特别高兴。传出消息说，“团派”要抓周泉纓和他后面的黑手。最滑稽的是江青可能看不懂《必胜》，就骂周泉纓是“小丑”。从此，周泉纓就得了一个绰号“小丑”（不仅“团派”叫，“414”派也叫）。我们有时还开玩笑，说江青是他的“教母”。

一天，周泉纓请我们几个改稿子和抄大字报的人，一起到二号楼二楼一个大房间开会。他说，“‘老团’扬言要抓人，我正希望他们抓我，事情越闹大越好。”我看，周泉纓完全处在一种亢奋状态。还说“毛主席都看了《必胜》，这说明这篇文章的份量。”然后他“郑重宣布”：“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你们是教师、党员、干部。今后，一概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他那神气，就像要上刑场就义似的。当晚，他又带我到新水利馆三楼一个小房间，里面挤满了人，门外还站了不少人。周泉纓说，这是“东方红战团”正在开会，讨论《必胜》，希望取得一致的意见。他说：“你看见坐在门口那张桌子旁的那个高个子吗？”我点头表示看见。他严肃地说：“这个人很好。如果我被捕，他就是我的接班人！”接什么班，他并没有说。不过，那的确是个忠实可靠、精明强悍的青年，他的笔头很快，而且一边写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辩论口才也很好。当时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后来认识了，熟悉了。直到我离开清华前，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他就是后来调到北大任党委书记的任彦申。

周泉纓是位传奇人物。据说，他离开清华后，先被分配在邯郸附近的一个机械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一次干活时，机器把他的右手食指切了下来。他不声不响，捡起那段被切掉的食指，到自来水里冲了一阵，用手帕包好受伤的手，又回去干活去了。那些工人得知此事，都十分钦佩，说他是条好汉。

1974年，有几个“414”的人找我说：“周泉纓来了，带来一份抄好的大字报，内容

不清楚，所以要贴在清华，因为清华影响大。我们觉得，无论内容如何，迟群、谢静宜是不会允许在清华园里又掀起风浪的。现在他们正愁找不到“414”的毛病，这个节骨眼上，他如贴出大字报，不正好将把柄送给他们？请你劝他一下，我们估计，现在只有你能阻拦住他。”我便借用科学处章征文家后院的一个小房间（在胜因院），请周泉缨来会面，用了一个小时，终于说服他当场把大字报烧了。周泉缨很不高兴，嘟囔了一句：“你们都变了，都不革命了，我以后要搞什么，绝不会找你商量！”

此后，他真成了一位大理论家，出了好几本书。果然，他没再找我或其他人征求意见，或讨论修改，或协助出版、发行等。但他出的书一定会送给大家人手一册，多要就多送。说句老实话，他的书，我看不懂。

评注与附件

[注 01] 用“昙花一现八百天”作本篇标题，我猜想在作者潜意识中，可能受到文革初清华园内曾普遍流行的将蒯大富比作“昙花一现的人物”的舆情影响。

蒯大富 1966 年 12 月中旬后开始掌权。掌权伊始的所作所为，已然不得人心。清华师生中常有人用“昙花一现”比喻他。既有警戒、提醒之善意；也是嘲讽之冷言；还有的出于见微知著而预判其命运。校园内同时也曾出现过一些将蒯大富与“昙花一现”联系起来的一些大字报。

昙花是一种灌木状肉质植物，一般在夏季的晚上 20-24 点左右开花，白色，长长的灯笼般的花朵，花瓣有紫色或血色纤细的色纹，朵上有许多长长的嫩绿的细丝，非常的娇柔艳丽，开花的时间却只有 3 至 4 小时。

1967 年夏季的一个晚间，清华西校门附近的一株昙花忽地开了（很可能是某个好事者从某家院子里的搬出来放在路边供人欣赏的），很多人赶去看。动农系的刘同学（我始终叫得出他的名字的）掐了一朵昙花，跑到工字厅，扔在蒯大富的办公桌上。刘同学大声说：

“蒯大富，提醒你千万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然后扬长而去，老蒯当场很尴尬。

这个故事非我亲见，是当事者刘同学亲口告诉我的。时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地点在南京逸仙桥。刘同学是我在414《井冈山报》编辑部时认识的朋友。那时我们都已毕业了，我分在山西，刘同学是低年级的，毕业晚一点，分配方案却比较好，分在南京。我的大舅舅是南京大行宫附近的511厂的工程师，所以南京是我从山西回乡的必经之站。我约了刘同学见面，我们倚栏逸仙桥，听着桥下的流水，谈论清华园的文革旧事。

当时，刘同学还告诉过另一则其它同学的故事，同样令我记忆深刻。

[注 02] 这句话与史实不相符。

从1966年12月21日“三总部”正式合并算起，至1968年7月27日，只有两年不到、600天不到。从“掌权”角度计算，何来“800天”之说。

蒯大富于1966年9月24日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之初，人数很少，并不掌权。当时在清华掌权的是“三临”（见[注15]）。直至1966年12月下旬“三总部”合并前后，蒯大富才开始掌权。即使计算得粗糙些，也只能提前至12月中。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后，蒯大富下令团派武装袭击，造成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其中129人重伤），酿成震惊中外的“七二七血案”。28日凌晨3点左右，团派各据点的队伍分几个方向仓皇出逃，但是9003大楼的团派队伍并没有撤，另有部分团派队伍在任传仲带领下仍然坚守化学馆、生物馆、明斋等少数武斗据点。在此后的三、四天时间内，蒯大富负隅学校西北一角，并企图通过谢富治搞出一个“3+1”的划分清华势力范围的方案。

所谓“3+1”方案，是7月31日谢富治在给工宣队作的“七点指示”中出台的：其具体内容是：

工宣队负责焊接馆、汽车楼、动农馆、招待所、附小、幼儿园等地，

井冈山兵团负责原东区全部、原西区全部和礼堂区全部，

9003 大楼由解放军负责保护，四一四负责主楼。

这个方案在“《井冈山》报”以“短讯”的形式刊登。谢富治的这个方案，遭到工宣队领导层的集体反对。当时工宣队的总指挥是 8341 部队团长张荣温，迟群、谢静宜等是指挥部成员之一。7 月 31 日当日下午，工宣队指挥部就派谢静宜进城向毛泽东作汇报，毛主席说：“———什么这条路线不能走，那个地段不能进，岂有此理，是犯了‘路线错误’。”这是毛对谢的批评。因为有了毛的这个重要表态，“3+1”方案没有实施过一天。8 月 5 日毛送芒果后，谢富治淡出清华，工宣队站稳脚跟，完全掌控了清华大局。

即使后来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蒯大富个人在名义上虽占有一席之地，但清华实际权力已经完全掌握在工宣队手里。

综上，将蒯大富掌权时间说成是“大约 600 天”或“两年不到的时间”是可以的。但不是“800 天”，也不是“两年多”。

罗征启对清华文革并没有整体研究，出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注 03] “替罪羊”是中国人的通俗说法，有时也常用于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评价。但在法律文件中，无论是刑法还是民法，“替罪羊”是不能入罪的，没有任何一种罪名叫做“替罪羊”。

无论是在文革中，或是文革结束后，蒯大富们都没有起到“替罪羊”的作用，事实上他们也根本不是什么“替罪羊”，而是中央文革的“马前卒”，是极左路线的“炮灰”与“打手”。他们在文革后所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以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为依据的，是罪有应得！

[注 04] 韩丁，美国记者。原名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镇人，1919 年 2 月出生。韩丁在中国居住多年，曾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一任主席。1971 年，应周恩来之邀重返中国，先后 5 次与周会面。

当时，周恩来总理建议韩丁到清华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最厉害的大学去看看。于是，韩丁来到清华，与师生举行有关清华文革为主要内容的座谈，长达一月之久。

经常参加座谈的人，直至今天还依稀可考。其中有工宣队指挥成员吕方正，四一四总部委员、科学馆卫戍司令王永县、四一四土建系分部负责人周坚同学、团派吴伟钰同学、朱同学等。

《Hundred Day War》（百日战争）就是韩丁在清华参观访谈的一个重要成果。

韩丁在该书《序言》一开始明确指出：“该书是根据当年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部分参与者的座谈会的粗略笔记而做出的汇编。至今在世的那些当年的清华人，肯定会发现某些事件的描述有重大遗漏和出入。”

韩丁于2004年5月15日，在美国马塞诸萨州康克市逝世，终年85岁。

[注05] 从1968年4月23日电机馆攻防战开始，到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的前一天，共计95天。

有些研究者将7月27日计算在内，所以说是96天。

但是，7月27日发生的是在蒯大富“抵抗还击”的命令下，团派武装对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武装对抗。这在“清华校史”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蒯大富的《刑事终审判决书》”中有明确的认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判决书（83）刑终字第42号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所以，“727”发生的冲突不能归属于清华两派武斗。

[注06] 据万润南《罗征启——夭折的接班人》一文所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罗征启四十四岁，成为中共接班梯队中的头号种子选手。他是第一批到中央党校集训的干部班班长。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纪云和尉健行，老罗是他们的支部书记。他被安排去接任韩英的团中央书记。”

万文的这则叙述与罗征启本人的回忆既有相互印证之处，也有不符之处。

罗征启自己回忆：“北京市委听说要调我离开北京市去团中央，就赶紧以北京市的名义把我送到中央党校“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中央也同意了。刘达亲自送我到中央党校报到。班主任是刘达夫人汪琼。班上有七、八十人。这批学员是当时中青年干部中行政级别比较高的，因为文化革命耽误了，所以年龄都偏大，我当时已四十六岁，在班里年龄还算比较小的。分两个班，十七支部和十八支部，我是十七支部支部书记兼班长。尉健行就在我这个班，田纪云是另一个班的副书记。”（参见：2009年2月17日下午至19日下午，杨继绳对罗征启的访谈记录）

[注 07] 这是一则罗书独家披露的史实。

“逮捕蒯大富”竟然是出自邓小平的口头指示，在逮捕令上签字批准的既不是当时的公检法部门的负责人，也不是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见当时的司法程序多么不规范。

[注 08] 这又是一则罗书独家披露的史实。

关于“罗征启代表家属原谅致其弟死亡的凶手之一”一事，影响相当大。在清华校友中，尤其是在当年的“四一四”校友中，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罗的这种态度并不能认为是一种典范，但体现了罗征启个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他是当事人、受害人，他和其它亲属的宽恕与否对案件的影响很大。

[注 09] 用“镇压”一词，似有不妥。过去习惯用的“武装抵抗”或“武装还击”，也并不准确。

历史的诡异在于：迄今为止，我们竟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给这件事定性。

“北京市中院对蒯大富的刑事判决书”是这样叙述的：“1968年7月27日上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被告人

蒯大富同另一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策划后，决定“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这一决定，向各武斗据点作了传达。下午一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拼了”，在离开静斋时把数十发手枪子弹给了武斗队员。任传仲等按蒯大富“抵抗、还击”的决定，带领人员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致使宣传动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判决书”中用的是“袭击”，用这两个字比较恰当。

[注10] 对于“414派”“立即缴枪，拆除工事”的行为，归结为“听从救命恩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指挥和安排”，也是不准确的。

校友周家琮也指出：罗当时在汕头，对这一段不清楚，可能也不知道老四当时正多次请愿，强烈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制止清华武斗，宣传队开进可谓一拍即合。

这件事固然体现了“414”主动响应、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意义，既是414的必然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必须指出：

一、当时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100多名414人员和6名团派俘虏的安全撤离问题并没有解决。

二、工宣队入夜后何去何从？接下来如何行动？当时这些问题都不明朗。如果工宣队入夜后撤离清华，第二天也不来了，那么已经撤除工事、交出武器的414就会直接面对全副武装的团派武装，只能全部当俘虏了。

以上两点是414的重大风险所在，对此，当时的414总部负责人也想好了退路。

对于解救科学馆人员的问题，在沈如槐与东区工宣队负责人柳一安的谈判中，柳作出了口头承诺。虽然口头承诺的份量比较轻，但沈如槐不可能要求工宣队签字画押。何况，解救被困人员也是工宣队七二七行动的题中之意。所以工宣队的口头承诺是可信的。

对于工宣队入夜后何去何从的问题，414总部同时作出了与工宣队共进退的决策，通过414“文攻武卫”代总指挥但燊通知每个据点作好准备，工宣队在我们也在，工宣队撤

离我们随同工宣队一起撤离。

[注 11] 罗征启书中多次强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

通常，这个观点被认作是马列主义的一个经典观点。所以，罗征启提出：“难道 727 两派截然不同的表现，就不是政治的继续了吗？这是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一定要解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罗征启的这个问题提得好！

周家琮同学指出：严格说起来“战争是政治继续”并非经典马列观点，而是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的论点，被马克思认同。周家琮摘引原文：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注 12] 直接因“罗征启案”致死的有：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普通工人），罗征启妻子的同学的母亲、80 多岁的印尼华侨林婆婆，因与罗案关联而死的原清华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直接与罗案同案受到残酷迫害而致残的有文学宓、饶慰慈、李康 3 人。所以，致死致残共 6 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稍后（5 月份）发生的“12 人反党集团案”也是“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的持续发酵而形成的。

蒯大富的团派制造“罗文李饶”冤案目的，是为了捏造出一个“操纵四一四”的反革命干部集团；制造“12 人”冤案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制造四一四领导核心及其主要领导人沈如槐的周围都是反革命分子的谎言。

两个冤案是两条不同路径，却是同一个根本目的：彻底镇压、摧毁四一四。

在北京市中院对蒯大富的判决书中，对这一冤案的说法是：“蒯大富还诬陷原清华大

学团委干部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个学生是“反革命小集团”，抓起来刑讯逼供。”

从中院“判决书”的行文看，贾春旺在六人之外。那么具体的六个学生究竟是指谁？

迄今为止，所披露的五个人是：邢竞侯、黄安妮、谢引麟、张琴心、楼叙贞。

第六个人是谁？虽有“可能”对象，但毕竟未能证实，故为“谜”。团派专案组所宣称的“12人反党集团”还包括哪些人？也没有搞清楚。

有人至今纠缠“12人反党集团”以谁为首？其实，这个问题也不会有确切的答案，而且也没有什么意义。

团派专案组虽有所指，但一向没有明确。他们也是草鞋无样，到哪儿算哪儿。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与“12人反党集团案”都是“战歌事件”与“陈楚三事件”的延伸与发展，抓陈楚三同班、同战斗组的邢竞侯的目的就是直指陈楚三。从这个目的出发，当然针对的是陈楚三。所以老团制造“12人反党集团”的目的，就是以12人之外的陈楚三为首。团派专案组的根本目的是摧毁并镇压四一四，从这个目的出发当然主要针对的是沈如槐。所以老团制造“12人反党集团”的目的，就是以12人之外的沈如槐为首。

[注13] 这一段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罗征启的历史观：历史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附件一：群友：关于“历史真实性”讨论）

[注14] 胡鹏池说：我之所以对罗书录入、加注、转载、传播，并没有得到作者本人文字上或口头上的授权或认可。我虽是擅自行动，但也有所依据，所依据的正是作者的这种正确的态度。

[注15] “临时革委会”的说法有误，应是“校文革临时筹委会”，当时称“临筹”。

工作组撤走前，根据中央指示，经工作组组长叶林提议，将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校文革临时筹委会，简称“临筹”，代替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临筹”的主

要领导成员是以刘涛、贺鹏飞为代表的干部子弟。研究清华文革史的校友们一般都认为“临筹”执行了“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临筹”、“临总”、“临主”，史称清华文革“三临”时期。时间长达3至4个月。

其中，“临筹”是最早出现的；“临总”是指1966年8月19日成立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临主”则是指在1966年9月16日，由“临筹”主持召开校文革代表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由各系选举代表组成的校文革临时主席团（简称“临主”），由其领导清华运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清华“8.24事件”后，“临筹”、“临总”完全控制了清华的局面，9月16日，“临主”产生以后，“三临”开始在清华“斗黑帮”。

[注16] 这句话应该是“可以不准大家讲，但是无法不准大家想。”

专制独裁者们的本心是既不允许大家讲，也不允许大家想。所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才有“腹诽”这个中国特色的罪名，才有“其心可诛”这个词。文革中的“思想罪”、“言论罪”与“腹诽”的性质差不多。

[注17] 唐少杰，清华大学现职哲学教授。很早对清华文革发生兴趣，也很早就进行了系统研究。2003年出版的《一叶知秋》是他最早的力作，虽在史实上也有一些不实、不当之处，但总的说来《一叶知秋》不失为一本佳作。唐教授的年龄比我们小一轮，没有亲历清华文革，而且当时唐金鹤、沈如槐、邱心伟与原蜀育的书都还没有出来，更没有蒯大富的书，唐教授凭一己之力能写成这样已经很难了。所以胡鹏池称赞少杰先生的《一叶之秋》是清华文革研究的一只报春的燕子。而且后来，唐少杰陆续又有很多重要的单篇作品发表。

唐这次到深圳的时间大约在2000年前后。那时我又从北京去了深圳。可能是在这年的圣诞节，由唐伟等人出主意，由我在深南中路上的《万源春大酒店》筹办、组织了一次圣

诞节清华校友聚会，参加者近百人，其中就有罗征启、蒯大富、沈如槐，唐伟、汲鹏，鲍长康、周泉纓等清华文革名人，另有韩爱晶和唐少杰。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除我和沈如槐，上述诸位都坐在靠门的一张圆桌旁，谈论的都是清华文革的事。还记得，韩爱晶不断掏小本子上做记录，唐伟对此心生反感。唐伟在《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写道：“在深圳饭局上，凡是见过韩爱晶猥琐表现的清华校友，都为你老孙推崇韩爱晶的美言和相信韩爱晶的谎话而感到脸红。”就是指这类事。

后来了解到，这次唐少杰赴深主要就是为写蒯大富而来。然而，后来出版《清华蒯大富》其作者却是许爱晶（即韩爱晶）。这其中所发生的变故，略有耳闻。

[注 18] 周总理找蒯大富谈话一事发生在 1966 年 8 月 1 日凌晨和晚上，分两次进行，每次约 3 小时。受蒯大富宣传影响，校友们原都以为第一次只有蒯一人。现已证明，两次都有其它同学参加。参加第一次谈话的还有刘泉和刘才堂。

谈话开始时，周总理曾说“毛主席指示我来找你谈话的——”。无论原话如何，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的。但除此之外，在将近 6 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周恩来只听汇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插言，连一句肯定的、鼓励的话都没有。这是很令人深思的。

在我看来，凭周恩来的经历丰富，阅人无数，他很快就能识透蒯的品质与本质，所以从一开始起就对蒯大富有警戒之心。

我们还可以再回顾一下，在文革中，周恩来与蒯打过很多次交道，但是蒯从周恩来那里捞到过什么稻草呢？什么也没捞着。

所以蒯大富在书中感叹道：“江青、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他们是比较明显的偏向我，批评 414 的，周恩来就从来不对 414 说一句批评的话。”

其实，周恩来对 414 也说过批评的话，但态度与语境与江青是有明显区别的。

（参见附件二：胡鹏池：周恩来批评四一四的两句话）

[注 19]罗征启问蒯大富：“12.25”行动，是不是有人叫你这样做的？”蒯说：“没有，真的没有。-----”

罗蒯这段对话发生在2000年。早在80年代对蒯大富庭审时，蒯已经坦白并揭发“12.25”行动是受到张春桥的明确指示的，法庭还曾将此作为蒯的一条立功表现。

而在2000年面对罗征启的诚恳询问，蒯大富却仍然在说谎。这样的说谎已经没有意义的，这种说谎属于性格上的“习惯性说谎”。打个不够恰当，但很深刻的比喻，就像某些女人有“习惯性流产”一样

又过了若干年，蒯终于在书中详述了事件经过：

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值班室单独召见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说：“我立刻明白了”，“听张春桥说这段话，当时我心里热血沸腾，等于是特别机密大臣来交给一个御林军最光荣、最高尚的任务。-----所以我很得意。”

蒯又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张春桥单独谈话，其它一个人也没有。”是唯一的一次吗？也不一定。

三个月前的9月23日，同样在中南海西门，张春桥还曾经接见过蒯大富，鼓动蒯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对此，蒯书138页有一句话：张春桥见我独来独往，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关于这件事，在沈如槐的书中，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后不几天，我在学校东区九号楼前的路上捡到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记录了9月23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蒯大富的谈话内容。我认识笔记本的主人，他是我校动农系的学生，不知何故参加了这次接见，还做了详细记录。后来，我找到了这位同学，向他了解了详细情况并把笔记本还给了他。

从谈话记录中我得知：蒯大富是在张春桥的鼓动下才决心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的，

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中央文革力图改变清华政治力量的对比的重要一步。中央文革已经利用蒯大富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打了胜仗，现在他们还要利用蒯大富向刘少奇发动新一轮进攻。”

[注 20] 关于“彻底砸烂”口号，最高领袖在“728 谈话”中是这样表态的：“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

显然这是一个总体上赞成的态度，只不过附加了一些条件。

[注 21] 不是几句，而是很多。

在“728 谈话”中提到“414”的次数有 27 次，其中老人家 22 次，江青 4 次，谢富治 1 次。在一个中央高层的召见活动中如此密集地、高强度地、反复地批评一个群众组织，是前所未有的。但在“728 谈话”中，林彪、周恩来却一次也没有批评“414”。连陈伯达、康生也没有。相反，陈和康一有机会就严厉批评蒯大富。

[注 22] 这里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前面还说“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

话能否这样说？另当别论。我个人不主张用这样的语言评价四一四。

事实上，四一四的“瑕疵”肯定是有的，“错误”也是“有懈可击”的。沈如槐不仅自己承认过，而且还对四一四的错误逐条作过具体的剖析。

这只是罗征启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也代表了很多四派校友今天的认识。

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并否出于什么历史文件、档案材料、或法律文书，主要基于校友们亲身经历的史实。

1. 众所周知，清华文革中发生了“百日武斗”，但是，每一次具体的武斗都是蒯大富的团派主动挑起的，从“4.23”到“5.30”到“6.30”全都如此，没有一次武斗是四一四主动挑起的。校友周忠荣说：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发生武斗。虽然情况各异，但可以说武斗双方都有责任。我这里说的“都有责任”是指双方都有主动攻击对方的错误举动，虽然有责任大小的差异。但是，清华大学的武斗都是老团主动挑起并不断升级的。老四仅仅是被动自卫。所以我认为：清华的武斗中，老团是“施暴方”，老四是“抗暴方”。蒋南峰称老四是“正当防卫”。有一份“86人名单”记载着干坏事直至犯罪的都是老团。所列出的几位老四头头都没有犯罪，仅仅是“记录在案”。有些“记录在案”的具体内容还只是出于工宣队平衡的需要。因此，我认为清华大学的武斗老团负单方面责任。

2. 清华文革中，蒯大富的团派制造了三大冤假错案：“蒋刘反党集团案”、“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12人反党集团案”。除了“蒋刘反党集团案”受到文革大环境的影响较深外，其余两大案都是蒯大富的团派自主创新、独立制造的。当然大环境的影响仍然是有的。而在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灭绝人性的暴徒与打手，制造了大量残暴的残酷的、灭良知灭天理、无人性反人性，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暴行。所有这些打手、这些暴行，全都出现在蒯大富的团派中。

一位知名的团派校友，本人也是这些暴行的参与者，他不无痛心地说：反人性的恶性事件都发生在团派，对此谁也无法否认。

这些暴徒在文革中及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证据确凿，铁证如山，是迟到的正义！

[注 23] 罗老师说：“刚开始两派争论是漫无头绪的，似乎只是权力之争。”

从某种意义上，“刚开始两派争论是漫无头绪的”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说“似乎只是权力之争”，则不确切。“权力之争”是有的，主要是在激进分子中，大量的普通群众中的争论则是以观念之争为主的。

参加 414 的普通群众，一开始主要因为对蒯大富的“唯我独左”、“唯我独革”、“野心膨胀”的做派与作风不满意；其次是因为凡在清华受过几年教育的校友对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有好感，对在清华已经度过的那几年有好感，不同意蒯大富们的“彻底砸烂”和“大翻个儿”；再其次虽然认同以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将矛头指向群众，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并不认为就应该打倒，更没有想到就应该打倒刘少奇。所以对清华“捉鬼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不仅不欣赏，而且认为是流氓、痞子的下三滥行为；也不认同 4 月 10 日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出现的对王光美的一系列侮辱人格的行为，更不同意蒯大富在会上所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主题发言，认为这篇发言纯属品格低下的泄私愤之作。（参阅附件三：胡鹏池：《你也有今日！——评蒯大富 1967 年 4 月 10 日在清华“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的发言》）

比上述原因更重要的一条原因是：蒯大富一头栽进江青怀抱，心甘情愿地充当中央文革的马前卒，而对周总理则忘恩负义、阳奉阴违，屡屡公然对抗周总理的指示，并怂恿井冈山兵团内部括起反周总理的一阵阵妖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原因：蒯大富刚一平反，校园内就流传了蒯大富的桃色新闻。

根据以上种种，广大师生员工认为蒯大富根本不符合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打倒了蒋南翔，赶走了工作组，已经是既成事实，但绝不可以将清华大学交到蒯大富这样完全不合格的接班人手里。

[注 24]关于“潜台词”，老万在一篇网文中说：

清华文革中的两派，都是“文革大民主”亲历者，也是受害者。因为这种“无法无天”的“大民主”，最后导致了全面武斗。就权力斗争的层面，在刘邓司令部瓦解之后，如杨小凯所说：权争的主要矛盾是以江青为代表的“新文革”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之间的矛盾。毋庸置疑，毛的屁股是坐在“新文革”一边的。

不管你自觉或不自觉，团派是“新文革”的支持者；414是“旧政府”的支持者。但就老罗和我而言，是十分自觉的。因为记得有一次罗老师跟我说，“如果到了……（比划一下大拇指）和总理之间摊牌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站在周一边。”

这也是在“414思潮必胜”中表达的潜台词，我相信，毛读懂了。

[注25]《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文革中出现的一篇重要的理论性的文章，又因为受到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与评点，影响更为深远。

唐少杰教授在《一叶知秋》中说“‘四一四思潮’独树一帜，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统观念和正统秩序来批评、怀疑并进而可能否定文革的群众思潮。”

对于该文，多年前就已发生了三位直接当事人周泉纓与罗征启、万润南之间的分歧与争论，也引起了校外学者如钱理群、朗钧等人的关注与研究。其中朗钧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罗征启现在的这本书中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但不难发现，罗书的叙述不仅与周泉纓的有矛盾与冲突，而且与万润南的叙述也有不小的差别。

虽然这是历史回忆与研究中的正常现象，然而却对《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

附件一：

群友：关于“历史真实性”的讨论

胡鹏池：

罗老师说“事实”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同一事物我从左边看，它偏右，你从右边看，它偏左，都是事实。但是个人感觉可能不同。你我一起都从正中看，他不偏了。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面，那另一面如何？不知道。因此我们不能说，我是绝对真实的。

这段话当然是对的。事实上，即使是我们同时看的同一面，也是不一样。

有人说她鼻子太高了，有人说她眼睛太小了。这是因为两个人看问题侧重点不一样，一个侧重鼻子，一个侧重眼睛。就算两个人同时看眼睛，一个人说她是单眼皮，不生动；另一个人说她是猪眼，极性感。这是因为两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

所以，最终决定真实的仍然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是“以什么为本”。

周天麒：

应该说事实就是事实，是客观和唯一的。所谓不一定真实仅在于描述(事实通常会被人为描述)者的立场、角度等不同而不同。如果不能真实客观地描述，那就不再是事实。

事实和对事实的评价是两回事

胡鹏池：

比如“727事件”，工宣队死了五个人。仅在这一点上的“真实”具有绝对的意义。说多说少都不真实。至于其它的“真实”都是靠“描述”，而描述永远是无法真实的。我们平常所说的真实，其实就是一个“逼近”。这种“真实”也就如同“求极限”一样。如果极限是2，有的人说1.9就是2，有的人说1.99就是2；但有人说1就是2了。而有的人则说-2就是2了。

周天麒：

事实就应该是真实。正确客观的描述即便不能全方位百分之百准确地还原，但与刻意掩盖、回避、歪曲的春秋之笔绝对是两回事。真实是事实的本质、关键和核心。

特别是在主要场景、情节…上不容含糊，你追问老蒯即是明例。

胡鹏池：

“事实”与“对事实的评价”不是两回事，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事实在发生时就是不真实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它的全貌。当事实刚过去一秒钟，它就越发不真实了，因为这时的描述就有了遗忘、忽略、片面与歪曲。比如文化大革命，它是不是真实？当然是真实，然而仅仅在“它曾经发生过”这一点上是共识。

我们认为是浩劫，小宝认为是民主的尝试，周泉纓认为是试错，钱理群认为是三种政

治，杨继绳认为是老人家为了实现乌托邦；老人家自己认为是反修防修。

我们为什么自信我们的工作有意义？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极限”的概念，并知道如何“求极限”。

周家琮：

@胡鹏池：可能你和罗间接受到西方后现代史学的影响，解构历史事实，否定历史真相存在，但你们有误读，思路不清。后现代史学在三方面否认历史客观性：

一是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强调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二是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是叙述，要编情节，用修辞，难免形成虚构和主观性，近乎文学的语言游戏；

三是后现代主义将历史文本化，颠覆了作者，文本，读者的传统关系，读者理解多元化地位上升，作者地位被贬低，认为语言是抵达事实的障碍，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使史学陷入客观性危机。

周家琮：

敝人保守落伍，对所有冠后现代的玩艺均敬而远之。我觉得多数是玩弄概念和辞藻，故作玄虚和晦涩。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客观，并没有超越十八世纪其不可知论的哲学祖先。武斗时读过一本英国人（？）秦斯的《物理学和哲学》，你和罗对历史真相的解构，均可以从该书对客观物理世界的描述中找到渊源。

胡鹏池：

@周家琮：不妨多讲点，权当是启蒙。

这些西方的东西，我确实一无所知，间接的影响也没有。如果有，也是自发的。只知道：往东走，腿胳膊朝西，吃饱了肚不饥。

只有在一种意义上可以承认“历史的真相”，那就是那个“极限2”。但这个“2”却不是两个苹果的“2”。

附件二：

周恩来批评“四一四”的两句话

胡鹏池

1967年8月23日，414派人参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行动。周恩来很生气，他说：
“没有想到清华414也参加了。”

1968年2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省军管会、省联总、红暴派时说了一段话，主要批评蒯大富。话尾巴上一拐，捎带上了414：“蒯大富开始是受刘邓路线的压制，我也亲自去过，好，后来什么都不听！当然我们要帮助他，教育他。外地都说要见蒯司令，他出了不少坏主意。”“当然对方414也不见得高明。所以对立情绪很厉害。”

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周恩来对414的两句批评的话。重复并强调一下：

第一句：“没有想到清华414也参加了。”

第二句：“对方414也不见得高明。”

（一）第一句的潜台词

第一句的潜台词：如果蒯大富参加，那不奇怪；但414也参加了，没有想到。

这当然表达了周恩来对414的不满意。显然，比“不满”更重的是遗憾与失望，话气不是轻飘飘的，情绪不是不在意的。

周恩来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此前他对414的印象是颇好的，414在干部问题、群众问题、十七年的问题，等涉及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与他的观点是高度契合的；414是温和造反派，暴力行为比较少，比较讲政策；414对他的支持与拥护是十分明显的；他对414是抱希望的，也是爱护的。正因为有这些看法，他才会冒一定的风险，拒不参加蒯大富的革委会成立大会，在清华文革最为关键时刻出手打击了蒯大富。周恩来当然很清楚，他的这一行为是极其有力地支持了414。但他就是支持了。

在周恩来看来：“火烧英国代办处”这种“打砸抢”的极左行为应该能为414所识别，不可能去参加。让他所料不及的是414不仅不能识别，居然也参加了。

所以，周恩来才会遗憾、失望地说：“没有想到清华414也参加了。”

显然，通过这件事，周恩来对414的看法有了变化。但是，他是不是据此就认为414也是极左的？那倒不至于；是不是据此就对414不抱希望了，那更未必。

他当然知道他的话一定会传到414，他想借此对414告戒并警示，希望414吸取教训，有所警戒，在复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握住方向。

414派人参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件事说明了什么？

414一把手沈如槐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参与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一愚蠢之举，被认为是414的奇耻大辱。

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三大极左事件，414件件有份。这一事实充分说明，414内部的极左思潮也是泛滥成灾。414中还有人据此做出结论：414对外政策是完全失败的，只要414走出校门，就必然要犯极左的错误。

1967年的夏季，极左思潮肆虐神州大地，声称以反对极左思潮为已任的414中的一些人也被裹胁其中，足见其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危害其深。”

笔者认为：文革中的所有群众组织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也无不打上极左路线的烙印。即使是清华大学八九红卫兵，虽然是保守组织，虽然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同样犯过很严重的极左错误的。

414犯过一些极左错误是很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无论是在校外，还是在校内，414都犯过极左错误，有的也是严重的。谈不上什么“奇耻大辱”，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所有群众组织必然的烙印。

虽然，414确以反对“极左思潮”为已任，但鉴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414所能识别的极左思潮只是极左思潮的一小部分，更大量的极左思潮它也无从识别，一样浑浑噩噩地被当作正确路线在执行着。

（二）第二句话本身“也不高明”

周恩来评价 414 的第二句话：“414 也不见得高明”。

我们首先得承认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确实“414 也不见得高明”；

其次还得指出，这句话本身“也不高明”。

毛泽东说过：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套用毛的逻辑，在文革中一切群众组织也无不打上文革的烙印。

作为一个虽以“反极左”为已任，同时又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群众组织怎么可能“高明”得起来嘛！除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除非不在文革中的中国“食人间烟火”。

就说周本人，他的一些作为同样“也不高明”。比如，对极左派的过分迁就，对“刘少奇专案”的落笔无情，对于林彪、江青等的表态与吹捧，对于“自觉改造”、“保持晚节”的絮絮叨叨-----虽属无奈，但同属“也不高明”。

即便如此，他仍然是“高明”的，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了。

文革中的中国没有绝对高明的政治家，也没有绝对高明的群众组织。只有相对高明和阶段性高明。蒯大富反抗工作组一度是高明的，到头来证明，他仍然只是被利用，最终当了牺牲品。一个被利用，又被当作牺牲品的人还有什么高明可言！

就像俗语所说，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也像中国典故“药渣”，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被太医当作药方引进后宫，治愈了宫女们的“性饥渴”产生的萎靡不振，宫女们容光焕发了，自己却被搞得形销骨立。皇上问太医这些男人怎么处理啊？太医说：他们成了药渣了，扔掉算了。文革中的造反英雄们无一不是“药渣”的下场。

孤立起来看，这第二句话当然是对 414 的批评。但从前后文看，这句话也实在算不上什么“批评”。

在这段话中，周恩来说：“蒯大富开始是受刘邓路线的压制，我也亲自去过，好，后来什么都不听！当然我们要帮助他，教育他。外地都说要见蒯司令，他出了不少坏主意。”
“什么都不听”，“出了不少坏主意”，这才是严厉的批评和失望的情绪。

周恩来他为什么要如此严厉的批评蒯呢？

因为蒯大富确实搞得太不象样了，野心膨胀，到处插手，对周恩来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周恩来当然知道这样严厉的批评，势必会造成他打击蒯大富，支持 414 的印象，岂不会被人抓住“拉一派、打一派”的把柄。如果 414 拿他的这句话做文章，敲锣打鼓地庆祝一番，那就给他帮倒忙了。所以周恩来这才在话尾巴上一拐。

老实说，这样的“批评”，与其说是批评，还不如说是为了平衡。

附件三：

你也有今天！

——评蒯大富 1967 年 4 月 10 日在清华“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的发言

胡鹏池

中国的网络语言日新月异，也许是世界上最丰富、最为花样翻新的语言。

前几年流行“屌丝”，这是一个新名词，为什么能流行？因为这个国家的“屌丝”太多了；又流行“我爸是李刚”，这是一句普通的“陈述句”，为什么能流行？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李刚的儿子太多了。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耻，而且是超无耻。

什么是“超无耻”？估且将其定义为“完全不知道无耻着的无耻。”

文革时期也有许多流行语。例如：“你也有今天？”

什么意思？用流行网络语解释就是：“你糗了，我特爽！”

因为当年没有网络，所以没有“屌丝”、“我爸是李刚”那么火。但的确常常挂在某些人的嘴角边。这些人全都是一时得意、得势、得志，“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小人们的“超无耻的无耻语言”。

当年有一位李钟奇司令员，在北京军区礼堂的休息室里，单脚立地，另一只脚踩在彭德怀元帅的腰眼上，一手叉着腰，另一手伸出两尺远，作红卫兵般英武状，大声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

李钟奇少将如是说；王紫锋中将也如是说；在许光达案中大打出手的两位姓党、姓都的下级军官也如是说；下令对一代黄梅戏明星严凤英开膛破肚、寻找发报机的安徽“红梅剧团”的军代表刘万泉的也是这句话。

文革时期，所有能借文革之机实现私人报复的人，全都是这句话。

当年的文革英雄，我们的校友清华蒯大富，得意忘形时也说的是这句话。

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一手策划、组织、指挥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陪斗者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四人。那天，笔者在现场，席地而坐在清华主楼东侧靠“工物系馆”的广场上（一般同学都是按系、年级、班级排队入场的）。大会开始后由老蒯做主题发言。他说：

“大家还记得吧，去年六月十九日，王光美蹬着自行车来到了清华园，一进门就洋洋得意地说：“少奇同志派我来的。”

刘少奇算老几！-----我们揪出了刘少奇，你王光美也跑不了-----

王光美，你抬起头看看你那丑样，还站在这儿干什么！把大家的眼睛都看脏了，给我滚下去！统统滚下去！”

刘少奇是毛江抛出来的，凭你老蒯算老几，怎么能说是“我们揪出来的”呢！

针对王光美，老蒯虽然没有说“你也有今天”，但话里话外全是这个意思。而且斜着眼睛一摆手，作不屑一顾状，喊道“给我滚下去，统统滚下去！”其气势又比“你也有今

天”高出好几分了，接近毛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了。所以，老蒯将他那篇发言定名为“粪土当年万户侯”。

就这几句泄私愤、没水平的话，就算将王光美批了。

接着，话锋一转批薄一波。老蒯说：“今天，薄一波也在这儿，这一次是你四进清华园——薄一波，你听着，我问你，你还记得去年七月三号你在清华大学都说了些什么吗？——你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小卒子，留下来当难得的反面教员’。想不到九个月以后的今天统统落到了你薄一波的头上——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马上杀掉你，留下了可以做难得的反面教员！薄一波，十个月前，你可曾想到你也有今天啊！”

“你也有今天”？也从老蒯的嘴里说出来了。

由不得他不说，他那时就这心态。可是，你怎么能说“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马上杀掉你”，你怎么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权力？又不知道自己算老几了吧！

李钟奇、王紫峰对彭德怀的仇恨，党、都二人对许光达的仇恨，都是文革前就已经种下了的；而蒯大富对王光美、薄一波的仇恨则是在文革初才产生的。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在人与人之间播下了无数仇恨，而文革又在人与人之间播下更多更深的仇恨。仇恨产生的同时，报复心理也产生了，中国人一向就有“恩仇相报”的情结。当一个人处于弱势时，他咬着牙根唱道“仇恨在心要发芽”，想着“秀才造反，十年不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盘算着什么时候“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当一个人处于强势时，他想的是“此时不报，更待何时”。

“你也有今天？”正是反应了一个曾经的弱者一旦转变为强者后急切的报仇心态。只讲恩仇，不讲是非。这种情结几千来深深地植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之中，并不是从文革才有的。但文革前大都尚属于个体谋划，文革才提供了“恩仇相报”的大舞台。■

2018年2月1日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二）

——扬威苏联大使馆

陆伟国

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还扫到了国际舞台上。“打倒帝修反”（即“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就成了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一。这一节，把几个涉及对外关系的极左事件放在一起讲。

1966年夏，和“恐怖红八月”同时，在国际关系上，掀起了极左的第一波浪潮。首先就是扫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头上，眼前现成的目标就苏联驻华大使馆。8月24日，数十万人在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举行更名为“反修路”的大会，会后就是大规模游行，连续了好几天。

两天之后，我们也去那儿游行了一趟。这一次，使馆前的军警比较多，在围墙和门外的十多米就排成了密密的人墙，挡住游行队伍不得靠近。使馆院内空无一人。望着院里米黄色的俄式建筑，青色的圆形房顶，看着旗杆上飘扬的是画着镰刀斧头、象征着十月革命的红旗，不由得感慨万千。小时候颂扬中苏友好的歌曲还不绝于耳，这就已经分道扬镳、仇人相见。曾几何时，因为有“反苏言论”而打了一大批右派，到如今已和苏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很有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而此时离1957年反右还不到十年。在1991年高层保守势力的9月未遂政变之后，苏联于当年的12月解体。这是原苏联各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就像东西德合并是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悲憾。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无可避免的终结。

在中国，有种很流行的观点，苏联解体就是它们“亡党亡国”，而且还依然用“阶级

斗争理论”解释说，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的问题，而是苏共在赫鲁晓夫、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没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

首先，对苏联的解体不能认为就是“亡国”。如果说它们是“亡国”，那么，对现在的俄罗斯人民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能说他们是“亡国奴”吗？他们明明都是拥有独立主权国家的公民。如果说它们是“亡国”，那又怎么来评价、看待这些国家现如今的政府和他们的领导人呢？能说他们是“亡国之君”或是儿皇帝吗？当初，以“苏联”这种国体来推进世界革命的方式，早已不合时宜，被历史所淘汰，是很正常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大多数也不希望再回到苏联那个年代。亡的只是早已撑不住的那个名字叫“苏联”的破棚子，而恢复了他们原先自己的国家。人家自己都没说“亡党亡国”，别人来讲这些话，合适吗？我们敢跟他们的人民群众和政府领导人当面说你们亡党亡国了吗？也就是关起门来吓唬自己的老百姓而已。

所谓“亡党”一说，也不准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苏联都解体了，苏联共产党当然也只有解散了。苏共在解散时，没有受到人民群众和党员们的抵制抗议。苏共的广大党员和苏联的人民群众是有水平的。苏联和苏共的解体是个历史的进步，他们顺应了这个潮流，在不可避免的社会转型面前选择了和平的方式。在关键时刻，俄罗斯军人和警察没有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避免了流血冲突，减少了社会震荡。

况且，俄罗斯共产党还在，它还是个合法的可以参加选举的政党，至今还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党。一些留恋“红色年代”的老年人和一些向往“红色年代”的年轻人，依然可以在那里正常活动。当然，这个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号召力大不如前，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原因不言自明。1996年的俄罗斯首次大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能够进入最后一轮，与叶利钦竞争，只是最后失利了。当叶利钦拿出斯大林“大清洗”的影象资料，人们纷纷弃俄共而去。这表明俄罗斯人民在选择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时，害怕回到旧的体制。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动摇了俄罗斯人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俄罗斯共产党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那就要看他们自己的努力，怎样去顺应和推动时代的进步，怎样去代表更多人群的

利益和愿望。

苏联解体二十多年来，人民生活是有提高的，社会的民主程度更不待言。就经济总量来说，有些指标看起来小了。其原因，有的是前后统计口径不同，有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的则是原苏联的经济模式有很大的水分，是“炼了钢铁造机器，造了机器再炼钢铁”的那种在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模式。这种模式，看起来数量规模很大，其实与人民生活没多少关系。好比一台机器，听起来声音很大很热闹，其实基本上是在空转。我们的五、六十年代，也是这么回事。

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国，大多数已走上了正常的社会发展道路，早已经成为正常的国家。即使是被一些人垢病的“休克疗法”，也并非一无是处。从1991年以来的二十年间，他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大多也都翻了一番，已经步入了相对正常的发展道路。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对于苏联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他们的社会是在进步。面对他们，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平常心，坦荡处之，实在没有必要去替别人“常憾憾”。不否定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模式，并不是说别的国家也都要按照那个模式去做。就像我们有自己的模式，也不一定非要去否定别人的模式。

有个人，化名“王小石”，对苏联旧体制的解体痛心疾首，并引申说“中国如果动乱，会比俄罗斯更惨”。这完全是在危言耸听。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俄罗斯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惨什么呢？不过是旧有的一些特权阶层失去了他们的利益。而且，可以说，苏联解体是和平转型的良好典型。在苏联解体之后，整个俄罗斯社会总体上是平稳的，没有出现清算、复仇和暴力行为，更没有出现在六十年代吓唬老百姓说的所谓“党变修、国变色”之后“地主资产阶级要重新上台，劳动人民再受二茬罪，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情形。要说动乱，中国的十年文革那才是动乱，89年不也被说是动乱么？难道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还有比这些更惨的事么？

当年的苏联共产党要说有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在世界潮流面前没有认清形势、及时有效地改革开放，只能被动地、被迫地接受更为激烈的社会变化。而

这种变化，不一定就是倒退。苏联官场腐败的逐渐加重，根源在于斯大林逝世之后而那套专制体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有限度的改革和社会民主没能抵消权力高度垄断的弊端。这是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原因。

苏联的解体再次说明，事物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内因。斯大林之后，在苏共高层内部出现了垄断专制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整个国家里至高无上、指挥一切，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个集团，以它们的小集团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人民群众只有被领导、被管理的份。这个集团，逐渐腐败变质，难以自拔，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淘汰。这个变质，不是变成左倾势力曾经说的所谓“修正主义”，而是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当其时也。这个变化，本身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必然结果。而正是这一点才需要我们更多地联系实际、深入思考。

最近又出来一个观点，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他们的舆论失去了控制。这个观点是很可怕的，实际上就是要用专制来维护专制。难道为了死死维持住苏联那个已经散架的铁桶，就非得让苏联人民一直生活在万马齐喑的专制时代才行么？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过度垄断而民主缺失。

笔者想不厌其烦地引用三位俄罗斯政治家，他们自己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回答网民时说，斯大林时代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是以不可接收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么，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遇到了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违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

2009年10月30日，梅德韦杰夫在自己的博客里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

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和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制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和思想）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 and 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百年潮》2011年第6期）这三段话，对于目前还在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左倾错误所进行的辩解，也是种很好的回答。

在我国的学术界和政界翻来覆去、不厌其烦地大量讨论苏联解体原因的时候，苏联学术界也在讨论。在此，引用他们中的一位学者梅杜舍夫斯基的话：“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但与俄帝国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静地消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倒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它竟然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它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与人类理智的本性背道而驰。苏联不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它的结构模式的反常规性和无效能性而瓦解的，这种模式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像一栋房屋，是匆忙草率搭建起来的，它的整体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了任何支撑能力。可以说明这个基础论断的证据就是，在它垮塌之时没有任何人起来对它进行维护。与此同时，也丧失了用全新性质形式构建政治体制的机遇，因为，精英们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恰恰不懂得任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不懂得掌握制度性参数，不懂得任何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这样一来，由于离心倾向超过向心倾向，在20世纪末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体制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避免。”（马龙闪：《俄罗斯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说》，《炎黄春秋》2013年11期）这段话应该说得很清楚了。

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推动苏联解体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还有个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发生在八十年代末的那个人所共知的事件。而这还是目前所无法讨论的问题。

苏联解体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远不只是它为什么解体，而是解体之后应该再怎样向前发展。对这更重要的后一点，我们很少去关注。我们的注意力与其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因为批判了斯大林、还是因为抛弃了列宁主义；是应该怪赫鲁晓夫、勃

列日涅夫，还是怪戈尔巴乔夫、叶利欣？不如更多地去看看这二十年来他们走过的路程更有实际意义。苏联解体后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就是在旧的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失效之后，没能迅速有效地建立起新的民主和法制的现代体制，应有的改革没有能全面深入及时地进行下去。旧的弊端没能完全消除，而新的弊端又大量滋生。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苏联解体前后，多次绑架了领导层，使他们一次次地错过了改革的机会。这是今天前苏联诸国之所以还有很多不够令人满意之处的原因所在。倒过头来再去徘徊在旧体制的坟头，悲悲惨惨凄凄戚戚，是没有出路的。

虽然海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破坏不能完全忽视，但也不必再像过去的冷战思维那样神经过敏和脆弱（有关方面还没有指出过所谓的“海外敌对势力”，到底是哪些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不要被某些左倾思维者的故意夸大来搅乱我们的视线，甚至作为在人民内部大搞阶级斗争的借口。当年，日本侵略者倾其全力都没能打败中国，连蒋介石统治下那么贫弱的中国都对付不了。更何况今天强大的中国，外部势力是无奈于我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

所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的主要精力要放在我们国内，放在我们党内。近年来的大力反腐，在党内高层挖出了一批批的巨贪，还不足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吗？那些有影没影的所谓“海外敌对势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力么？我们的的党我们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和最大威胁，显然就是党内的贪腐特权势力。所以，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行现代民主，来清除腐败，提高执政能力，才能使我们的党真正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带领人民群众向前迈进，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苏联解体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的这场剧变，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对它的成因和深远影响，至今估量、研究得不够，有些观念也是陈旧得很。实际上，即使是我们当今的一些问题，从他们那儿也是可以找到

某些启发和思路的。

2013年再次担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签署法令,规定所有官员不得拥有外国护照和外国银行帐户,要求官员必须登记和公开个人财产,否则就辞去职务。这样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抓到了点子上,能使全国人民精神振奋。而我们这些年来又能做到多少呢?对用纳税人缴纳的税赋开支工资的行政官员,要求他们登记和公开个人财产,是防止官员腐败很有效简便的措施,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实行的办法。在我们这儿,连这样的话都不敢说,甚至不让说,更不要说去做。反过来还要说人家“亡党亡国”,不但是滑稽可笑,自己不觉得汗颜吗?这些话,有本事敢去对普京讲么?甚至还要一面对内说人家是“亡党亡国”,另一面对外又要跟人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装成好朋友的样子,能自圆其说吗?

我是学俄语的,对原苏联各国人民、尤其是俄罗斯人民,有更多的一层感情。愿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上一路前行。■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五）

——沙洋干校

宋翔雁

一、干校迁址

当事件进入三月下旬正值将要准备春耕的时节,干校又开始了迁址的动员和准备。所谓迁址是指地院五七干校因军宣队改由湖北省军区派出,地院也经中央批示决定迁至湖北省重建,故干校须由江西再迁至湖北沙洋重建。这种反复穷折腾式的劳民伤财行为,实乃因毛氏在不同场合、不同因由的非正式会议上,即兴提出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工人

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领导高等院校；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诗人般遐想”式的论断，在未经严肃的讨论和严谨的设计考量，又未经试验取得经验，就以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公开发表、下达，驱使众多将最高指示奉若神明的追随者们一哄而上所造成的。

正式迁校大约是从五月中旬开始，我们经由井冈山、韶山、长沙、武汉，最后抵达沙洋。因此行众人沿途要参观井冈山、瞻仰韶山毛泽东故居，在长沙、武汉都作了必要的停留，故到沙洋已是六月初了。沙洋原本是一处劳改农场，这时则腾让给我们，成了干校的新址。因沙洋地处江汉平原，土地属盐碱地性质，比较贫瘠，地下水位很浅，但不宜饮用。因周边无山，加之因没有基建任务，无石可采也无需采石，故我被调往放牛组放牛，昭明则安排在食堂干活。

当我们抵达沙洋时，农耕季节已过，大田里的作物都是原农场劳改犯们种的，眼下所需的管理工作量很有限，加之再无各种批斗大会和小会要开，所以众人显得十分清闲，都各自忙于自家的事情。由于传闻地院已初步决定暂先迁至湖北江陵原地质部第五石油普查大队原址，五普的职工已经迁走，房屋院舍已然腾出并交割完毕，现急需一批人迁往江陵接收整理。所以又引起众人对自己去向的关心。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回京已无望，但若调往江陵这无疑是较好的出路，因彼处毕竟是一个小城市，生活和教育条件要比沙洋好许多，故都眼巴巴地等待着最终决定的宣布。而对经历过此前这场浩劫的我们来说，全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深知，今后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争也没用。我们只求生活能尽快安定下来，此后再视可能作出相应的选择。

二、打井的难题

大约到六月下旬，沙洋干校负责人（姓名我已想不起来了）找我去校办询问打水井事宜。他向我说明因干校人数比原来猛增，饮用水供应压力很大。经了解，当地浅层地下水

不能饮用，需要取深层地下水。为此需要哪些设备和器具？我向他说明了打井设备和器具的选择，现在尚无从谈起。必须在明确得知井位处的地层剖面、所取含水层的深度、厚度、补给情况及岩层性状，以及日采水量的要求等相关情况明了后，尚需先完成钻井井身结构的设计，然后方能确定。现在只能笼统地说需要钻机、钻具、钻头、井管和过滤器、动力和发电设备、专用和通用工具等大的类别，但这并不解决任何问题。该负责人肯定是原地院的干部，只不过对钻井行业全无了解，因此我讲完后他更是一头雾水，只能不了了之。

没过了几天，他又把我叫去咨询。他对我说道：经军宣队与部队联系，得知这一带打井需用美国出的牙轮钻头，但这种钻头很贵，一个钻头就得好几千美元，我们怎用的起呀？！对此我解释道：64年以后的情况我说不好，因我64年10月至今没有搞过业务，对这些年来国内外的技术发展情况不了解。但64年以前，我国石油系统确实未能很好解决中硬岩层钻井用牙轮钻头的研制工作，基本是靠进口苏美的产品，地质部门更无这方面的能力。而进口的牙轮钻头确实很贵，但具体数字我不清楚。如果说这一带打水井需用牙轮钻头，那肯定是因为含水层是卵砾石地层，而且所处位置深度较大，只能用回转方式钻井，而在此类地层中钻井确实有相当的难度。听后他接着说道，难道一定要用这种钻头吗？我问过高云鹏（当时他是干校的财务负责人），他说要这么多钱，干校根本拿不出，还是别想了！这样不就等于没路可走了吗？听后我明白了，干校因饮用水紧张，想打一口水井，但又因经费紧张，正在犯难。于是我告诉他，因国内没有大深度钻井用的冲击式钻机，故埋深超过60至70米的卵砾石地层只能用牙轮钻头进行回转钻进。但因水井的井深一般不是太深，故井管、过滤器外径对成井直径的要求远低于石油钻井，所以可以考虑用油田报废但仍能使用的旧牙轮钻头来打井，这样费用问题就不大了。

我的这句话让他心动了，随即又问道：到哪儿去找报废的旧牙轮钻头？我告诉他附近的江汉油田正在会战，说不定就能找到所需的旧钻头。但眼下你想在哪打井，井身结构都没有，没有尺寸怎么找钻头？但为让他放心，我又告诉他，江汉油田的会战刚开始，没几年结束不了，等这边的井位和井身结构确定后，再派人去找也不迟。听了我的解释后，他

似乎有如释重负之感地说道：干事还是得找懂行的，你说的不仅让我明白了，而且也觉得有解决的希望了。对他这种可能有些喜出望外的情绪，我还是给他泼了点冷水。故说道：我讲的只是大概齐，没有见到钻井井身结构设计和地层剖面之前，刚才所讲的一切你都不能当真。而且届时一切还得和施工打井的机长合计，必须得到他的认可后，方能作数！因为我的想法是因陋就简的凑合干的办法，不像正式的工程施工设计那样，一切都得按规范标准进行。若那样做，可能就得花几千甚至上万美元买新的进口钻头了。他似乎与一般行政领导不同，说话不怎么遮掩。故听后又说道：看来你是被整怕了吧，怕出了问题会找你算账是不？对他此言我回答道：也不尽然，但我说的却是实情，到时真要实施时，你就会明白的。因为要想打一口超百米的供水井，花费绝非小数，不认真设计并合计好是不允许的。对此言他倒是点头认可了。

又过了几天，他又派人约我去他办公室。见面后他就问我，江汉油田哪儿你有关系吗？我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故反问道：你想干嘛？他倒也坦率地说道：我想让你跑一趟，看看能否弄一个他们报废的三牙轮钻头回来？听后我一惊地说道：你这也太没谱、太急了点吧？钻头按美国 API 标准是成系列的，每个系列十几甚至二十几个尺寸，你的水井连设计都没作呢，让我怎么个找法？别说我没关系，就是有关系，也不可能给你找十几个到二十几个钻头呀！对我如此不客气的回话他一点没生气，反到乐呵呵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给我并说道：就是这个尺寸的钻头。我一看纸上写的是直径 $9\frac{7}{8}$ 的三牙轮钻头，就奇怪的问道，你根据什么需要这样尺寸的钻头？他大笑道：我去西边部队的农场看了，他们那的水井就是买的这种钻头打的。我接着问道，那他们用的钻头现在在哪儿？他说，那是部队打井队的设备，和现在的农场没关系。我心想，他在找我了解情况的同时，还是做了一些情况调研的，是一名办事还挺下功夫的领导，不错！接着他又问我：油田那儿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说道：现在不好说，因原来机械教研室一位女老师后因两地分居调到大庆去了（她是 60 年 9 月与刘昭明同时分来地院的，她是石油学院矿机专业毕业的叫段雪润，分在机械教研室。报到后她与刘昭明同住一间宿舍并成为好友，64 年春，小段因两地分居调往

大庆），前段听说他们夫妻两可能要调往江汉油田参加会战。但是否已经调来了，却不清楚。听后他说道：你设法联系联系看，她现在是否调来江汉，若有熟人办起事来容易一些。若仍未调来，看样子也得跑一趟看看。面对他的执着我不好拒绝，回家后我与昭明说了这一情况，问她是否知道小段两口子现在是否已调来江汉，昭明说他们早就到江汉了，那会儿我们还在江西呢！

三、到油田要废钻头

第二天我就将这一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听后他特高兴，并很客气的说道：看来得辛苦你一趟了，抓紧去趟油田，看看能否找到这种尺寸的报废钻头，需要多少钱，届时打个长途回来，能定下来最好。你先回去准备一下，先到财务那借点出差费，明天就走行吗？我刚要走他又说道：你先按两个人借出差费，再找一个人一块去，有事好商量。总之，只要能找到仍然能用的这种钻头，就在那把手续办好，咱们派车去拉都行。第二天我和一位姓白的干部一道去了江汉油田（白是政工系统的干部，过去从未与他打过交道，也不知他在校的具体工作，从干校回京后，他调往地科院并提升为处长了），到油田后，先到招待所住下，再与小段联系，一切都很顺利。当晚我们去到小段家里，向他们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听后，小段爱人仇射阳对我说，这事你们就不要再找指挥部了，走官道太啰嗦。明天我要个车，陪你们到几个井场转转，若有，你们要几个都不是问题。说毕，我们一起聊了很久，他们文革中也都挨了整，对我的事也特别惦记（我被隔离期间，他们与昭明一直有联系），当问起最后情况时，尽管当着白某的面，我也没有隐瞒地说道：不堪回首，苦不堪言！最终还得靠假话违心认罪，否则可能现在也难脱身。总之，这次我算长记性了，今后不会再介入政治纷争了。但今后路在何方，谁也说不清，地院已决定迁来江陵，而我们个人还很难说，先在干校混吧，我自己觉得过去学的那点业务，现在恐怕也扔得差不多了。你想，我已经快八年没摸过书本、也没接触过专业实践了，就是想当个工人，年龄和体力

也都存在问题！但小段仍宽慰我说道：你不用这么悲观，你和昭明的基础和能力我清楚，需要时很快就能捡起来的！老友知己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时间不允许，都快到子夜了，我们才辞行，老仇怕路不熟，坚持送我们回到招待所，并说明早上班后，他要个车子过来，让我们在招待所里等他。

第二天，老仇带我们去了三个井场，其中一个井场挥挥说没有用过这种规格的牙轮钻头。另外两个则说用过，废旧钻头都丢弃在废料堆处，得自己去找，因现在井场人手不够，没法抽人帮忙。于是我们三人就自己去废料堆处查看，很快我们就找出了四五个能用的钻头，我请井场指挥找了一名钻工拿了规尺，分别对钻头进行了测量。测量后，在两个井场分别各有一个直径在 $9\frac{1}{2}$ 和 $9\frac{5}{8}$ 之间，而且周边磨损情况比较均匀、牙轮活动正常且晃动较小的钻头被我们选中。在我们与井场指挥交涉后，他们极其痛快地说：能用你们拉走就是了，并分别让工人帮我们装上了汽车（因一个钻头少说也近 20 公斤呢，而且是个浑身油泥的铁疙瘩，很不易抱起来）。分手前，我谢过了两位指挥，并向他们请教道：按现有的钻头直径在卵砾石地层中打井时，一般裸眼井径能有多大？他们说：这决定于裸眼钻进的时间和泥浆的质量，按公制标准讲，大约能在 280——320 mm 之间。这时我心里盘算着，有这样的井径，对顺利下入 $\phi 250$ mm 的过滤器丝毫不会存在任何问题。而且每个钻头均具有穿透 20——30 米卵砾石地层的寿命，可为干校打水井节省相当一笔费用，应当说称得上不虚此行。

回招待所的路上，老仇对我说：你们带这么两个铁疙瘩去武汉坐火车太不方便，建议你们从潜江乘船直接去沙洋，让干校派车去沙洋码头接你们更方便些，我可以找车送你们去潜江码头。老仇的主意确实周到，我们接受了他的意见，回到招待所，即打长途向领导做了汇报，并说明准备乘船回沙洋，让车到沙洋码头接我们。

当晚我们仍到小段家作客，对老仇的辛劳和周到，我们再三表示感激。当晚我们又聊得很晚，其间小段把我单独叫到里屋，并与老白打招呼道：我们有点私密话要讲，对不起啊！进屋后小段对我说，她又怀孕了，想要一个男孩，因为老段家“绝后”，为了圆父母

的梦，他们决定再要一个，老仇也同意，但能否如愿就要看天意了。他让我将此情况告知昭明，我问清了她的预产期，并祝愿她天随人愿！

第二天，老仇如约将我们送到潜江码头，潜江到沙洋的直线距离不长，但荆江这段水道曲曲弯弯，故航行时间竟需十多个小时。因这几天来，我睡得很晚，加之想事多，睡得也很差，而且在井场里来回跑动，浑身觉得十分疲惫。此时要干坐十多个小时我觉得很难承受，故我与老白说道：因这几天我睡的不好，人太疲惫，我怕坐十多个小时受不了，想去换个卧铺票。老白说，大白天乘卧铺怕不行吧？我回答道：大不了差价我们自己出呗！老白对此无异议后，我就去改了票并搬至卧铺舱躺下了。沿途无话我很快就睡着了，下船时老白还说：看来你真的乏过头了，几乎没醒呀！顺利回到干校交差，头头看到两个铁疙瘩乐得合不上嘴，夸我立了大功！我回道：甭夸，今后不挨整就好！他接着说道：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别尽瞎说！我知道他无恶意，就赶紧去报账了。果然应了老白的话，高云鹏一看大白天坐卧铺就提出了异议。对此，我未做任何解释，只说道：您就按着差价报呗。不知是否老白找了头头，正在结账时，头头来了说道：你这老高怎么死心眼呀？人家辛辛苦苦弄来两大钻头，一分钱没要，你这点差旅费算个啥呀？给我，我来签字！其实，我觉得人家高云鹏并没错，制度嘛，具体负责的主管更需执行，但见头头如此担纲，我也没必要要高姿态，否则反会让人反感！

四、回京看病

此后一段时间里，干校陆续有人奉令调往江陵，但更多的人，则整好了家档后请假回了北京。人心不定的情景弥漫于沙洋干校。我则借机制备了一些木工工具，开始打制自己的第一个木工制品——储物纱橱，而且一举成功并博得沙洋自制家具“第一名”的美誉，当然这只不过是干校留下来的人们自取其乐的一种方式罢了。但后来，一名当地的木匠，看到了我打的纱柜后也颇为赞叹，并对我自制的木工工具大加表扬，还邀我到他家作客，

结果还醉倒他家住了一夜。

到七月中旬，昭明得知其母去院内小卖部买菜时，被一骑车的学生撞倒腿脚有些不便时，心里极为着急。我们商量后，决定昭明立即请假后带孩子回京看望，并让老人再作必要的检查。请假事宜极为顺利，再无要求核查一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又恢复了过往领导对职工们的基本信任了，这点让人很感欣慰。准假后，我先送昭明母子去潜江看望小段夫妇，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由老仇安排我们搭油田的车去武汉，再转乘火车赶回北京。待送走昭明母子后，我即回到沙洋，继续制作我的纱柜。

随着时光的流逝，沙洋干校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回京后滞留不归，一部分人奉令调往江陵。昭明母子也随大溜逾期未回，并借机留下尽可能多帮老母做些事情。约到九月中旬我亦奉令调往江陵，到江陵报道后，并无具体任务下达。借此机会我立即向领导提出，因隔离期间的条件恶劣，导致我左腿气 bloodstream 不畅，夜晚左足经常疼痛致醒，日间行走时有跛行甚至摔倒的情况，申请前往江陵较大的医院检查就治。对我的申请，江陵学院的医务部门和领导毫不为难就批准了，并介绍了该去的医院。经当地的医院检查后，立即确诊为左腿闭塞性脉管炎。但西医没有很好的对症治疗方法，建议由中医进行保守治疗。基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可能十分严重的情况（截肢），我又向领导提出申请回京做进一步的检查并确定治疗方案。

经江陵院领导研究后，准我前往北京检查治疗。行前我将江陵所有的东西均打点装箱并包装好，若学校再迁址时，就可托人直接装车发运，不必我们再回来处理了。这点考虑还算有点远见，最后东西全部请人托运回京了。因学校迁往湖北一直拖到75年8月8日李先念批示下达后方才动了真格的，当时以专列作手段，将学校近千名教职工沿京汉线直接送往武汉，中途停车加水，但不允许任何人员下车。对广大教职工采取的措施不可谓不严，所差的只是没有配备武装人员进行武装押运罢了。而湖北省委出于无奈（因省委反对地质学院选址武汉），只得将来汉的教职工分别临时安置到当地近十个高校点，以及地质局管辖下的有关单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在京高校的外迁就跟赶鸭子一般，所谓关心

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最高指示，早就置之脑后了，出于政治上的需求，这种生硬的做法怎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戴呢？

我大约于72年10月下旬回到北京，到京后即刻去北医三院检查，当检查确诊后，三院大夫推荐我去宣武中医医院（后并入宣武医院）专门治疗脉管炎的的科室就医。回校我将三院的确诊和推荐意见向留守的校医室负责人丁大夫汇报，获批后，我即前往宣武中医医院就诊。但当时脉管炎科的专家大夫已病故，接替他的是其夫人石晶华大夫，据称石大夫的医术虽不及其夫，但在国内目前仍是一等一的高手。得知这一情况后，令我十分高兴，觉得还算幸运！

石大夫检查后很明确告诉我，你左足足背的血管已基本完全堵塞，现在要通过药物帮助建立侧支循环（即足部其他分支血管），借以尽量消除当前的症状，但要想达到以往正常循环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并告知整个治疗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当前中草药有些短缺，不易抓齐，需要自己去想办法，药味不全会影响疗效的。遵照石大夫的意见，我坚持就医半年有余，最终侧支血管的搏动得以建立，左足夜间疼痛的情况再未发生，而且跛行情况较早就已消失。据此，石大夫对我说道：你的治疗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今后要注意下肢的保暖，每晚都要用热水泡脚并注意运动。我感谢石大夫的精心医治和高超医术，这也算上苍对我的惠顾，至今我左足从未在夜间疼过，只是当走路较多时，左足会有被拌的感觉（即由因循环不好出现下垂——没能完全随大腿提起而导致），这也就石大夫所说的不可能和未患病前一样的情景了。

在此还要提及一点的是，当时给我开的药剂量大且药味多，在药铺很难抓全。多亏此前在长田给我检查的校中医大夫（物理教研室张待勉老师的的爱人），用她在校医室药房里保存的草药为我配齐，否则难有如此效果。■

【文摘】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节选（下）

——文革中的惨痛遭遇

郭影秋

我认识的康生是个什么样

6月1日下午正在市委开会时，李雪峰通报说康生给他送条子，说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对此还有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本来这张大字报就是由康生与曹轶欧私下鼓动组织写的，他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将大字报稿直接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不过，他当时尚摸不透毛泽东究竟会对这份大字报持什么态度。基于这一点，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5月26日康生与我有一些谈话可以证明。他的谈话是从大字报说起的，却有些闪烁其词。他说：“我对聂元梓这个人的印象不好。”但“不管她过去怎么样，批评宋硕是对的”。他还说。聂元梓作为党委委员，总支书记，贴大字报相当恶劣。他们这样一搞，群众糊里糊涂跟上来，外校也跟上来，就乱了。”这说明康生当时还不得不附和多数人的看法。但他话锋一转又说：“北大会不会乱，很担心。不是担心他们的大字报，而是看北大党委采取什么态度。有两种态度，第一是继续按彭、刘，郑那一套领导北大；第二条是同彭、刘划清界限，搞新的一套。如搞第一种态度，还做保皇党，就不行。学生不造反，我们就大闹天宫。”所以“乱不乱，不决定聂和学生，而决定在党委，关键在党委，关键在这里。”从他的说话看，支持聂元梓的意向明显，却又模糊其词，有保留余地。但在毛主席明确表示了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肯定后，他便雀跃欢腾起来。他曾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要广播聂的大字报的通知），

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

6月1日当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我在出席市委会议之后，赶到钓鱼台。当我进入会场时，已经有几个人在座，因为都听到聂元梓大字报的广播，自然都围绕北大文革的事在议论。听说中央决定要派工作组到北大，人选也定了，组长是张承先。正在这时，陈伯达来到会场。我和陈伯达过去虽见过面，说过话，但无任何个人交往，这时才算正式认识。他听到大家议论向北大派工作组的问题，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张承先这个人不大理想，我和他一起做过救灾工作，他身上老挂着药瓶子，身体不好，最好能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做完这个工作就能留在北大工作（当校长），这样的人最合适。我看要是你能去最好了，你去北大最好。”我则随即回答说：“我不能去，北大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再说北京市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摊子事也不少，我还有人民大学的事。”我和陈伯达说话过程中，康生已步入会场落座。大家议论来议论去，还是觉得就是张承先了。这样，张承先接市委的通知当晚就带工作组到了北大。

那天晚上，李雪峰及国务院外办的张彦，还有我和市委的一些人都到了北大，李雪峰与张彦还先后讲了话，从北大回来已是后半夜了。

从上面叙述的情况可知，不仅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康生、陈伯达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异议，而且还在议论究竟派谁去更好！同时，在派张承先去北大的前一天，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5月30日向在外地的毛泽东请示：拟派工作组由陈伯达领导到人民日报社，毛泽东也表示过：“同意这样做”。所以，5月3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就已进驻人民日报社。按照共产党搞各种运动的惯例，派工作组似乎是很正常的。

继北大派出工作组之后，在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的过程中，陈伯达、康生不仅多次催促我“要快派！”“赶快派！”“派不出也得派，要么你自己去！”而且在北大工作组改组时，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还给我写过信，希望我能增派她在北大工作组担任副组长。记得

有一次，我和吴德到北大工作组去，那时运动才开始一个礼拜。当时工作组组长是张承先，组员就有曹轶欧，我的印象很深。他们说已经给少奇同志写信，要调一个营的队伍去北大，并且提出来门口要站岗，要武装站岗，要军队控制学校局面。这个队伍已经调来了，就住在北大附近。当时吴德没有说什么，我反对。我认为不能这么做。北大是一个学校，北京一共有 59 所高校，假使每个学校各个门都要派上武装，十个营也不够！而且一派部队到学校，问题就复杂了，矛盾冲突就多起来了，怎么办呢？研究结果是，就用便衣的形式。就北大一个学校有，其他单位没有，因为北大闹得厉害一些。便衣在内部做为保卫人员，在内部维持秩序。我记得很清楚，那次会议曹轶欧就参加了，怎么能说她没有参加工作组呢？后来，驻北大的工作组改组了，改组的情况我不了解，曹轶欧没有当上副组长。这时，我接到曹轶欧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不能做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请把我的名字从工作组撤掉。”我看了信之后，才知道没有她了。我就连忙写了信向她道歉。我说：“北大工作组的改组我并不知情，没有安排您做副组长，我也觉得不恰当，但北大工作组副组长的安排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请予谅解。”这一事例说明，康生、陈伯达一伙，当时不仅不反对工作组，还积极对工作组组长的人选出谋划策，甚至要求当副组长。后来，风向突变，他们摇身一变，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风向变化的起因是工作组与“造反派”产生了矛盾。毛泽东认为派工作组是设置障碍，制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手足，不利于运动的深入开展，对工作组产生反感和不满。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人，以灵敏的嗅觉，闻到毛泽东的意向，暗中唆使“造反派”闹事，以推波助澜、加剧矛盾、扩大事态。

当时工作组与“造反派”的矛盾，突出反映在北大、北师大、清华等有名的高校。6月18日北大的一些“造反派”擅自揪斗了几十名干部和教师，采取了抹黑脸、戴高帽、挂牌子、设斗鬼台、打人、罚跪，甚至侮辱女性等各种违反政策的错误做法。工作组闻讯后，赶往现场，予以制止，并于当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张承先在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不经过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错误的，容易被坏人利用，“六一八”事件本身

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等等。此后工作组将此事件写成《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刘少奇批准转发了《简报》并有批语：“中央认为北在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7月6日，在我主持的全市工作组负责人的经验交流会上，还请北大工作组介绍了经验，也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肯定。但是，聂元梓等“造反派”却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工作组的做法是镇压群众。我事后得知，远在外地的毛泽东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她还将这一看法迅即传给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这些人又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各校的“造反派”。但当时，我们在北京市委工作的同志都不知情。很快，北师大也发生了“六二零事件”。

具体情况是6月20日该校的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等人贴出大字报《孙友渔把运动引向何方？》，强烈反对工作组。对此，孙友渔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广播讲话，对于大字报列举的事情予以澄清，并指出反对工作组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干扰。如此一来，矛盾越来越激化。在此过程中，我曾到北师大做过调查，看过大字报，同时也应围观的师生员工要求在露天的场地上讲过话，大意是：希望北师大的师生员工按照中央的部署，在以孙友渔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下，摆事实，讲道理，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批评，可以帮助，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少数人浑水摸鱼，扰乱阵线，把运动引向邪路。不料，我这个讲话，也被“造反派”，批判为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宣言书”，还有人给我贴出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北师大的“造反派”之所以嚣张，我事后知道，背后也有康生及“中央文革”的支持与煽动。曹轶欧还有林杰等人就曾到北师大就“六二零事件”进行过所谓的“调查”，幕后为“造反派”撑腰打气。北京市委的调查和我的讲话，被康生等认为是和他们对着干的。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到北京后，形势更加急转直下。据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拒绝刘少奇要求见面的请求，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在此期间刘少奇也于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我曾参加过一次。会上对于是否派

工作组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不主张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张派。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总理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意思不是很明确，似乎是不主张派。少奇马上针对周总理的话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会上自始至终对是否应该派工作组争论不下。

接着又开中央扩大会，包括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李雪峰、吴德、我及高扬文、马力等都参加了。会上又发生了很大的争执。陈伯达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局的都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我是请他们去学习的。”他这么一说，包括当时了解情况的李雪峰等人都不好再讲什么了，都不说话了。会上还就是否撤工作组问题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撤，有人主张不撤，即使是认为有问题的工作组，也可以撤下来，再派另外的人去。就在这时有人写了条子交给康生，康生看后交给黄志刚，黄看后又交给我和吴德。我看了这张条子，是曹轶欧写给康生的，上面写道：“我和戚本禹同志都建议北师大罢孙友渔及翁世功两人的官，伯达同志同意。”陈伯达在字条旁边写了“我也同意”，我和吴德把这个条子交给李雪峰，李雪峰在条子上批了一行小字，意思是“还要考虑派人到北师大工作的问题。”为此，会后，北京市委又开会研究北师大问题。会议进行中，李雪峰通过电话与薄一波、陶鲁笏、何伟等人联系，经磋商再派人到北师大。人员由三方面的人组成，一是北京市委，二是国家经委，三是教育部。而对于罢孙友渔官的问题，李雪峰却没有明确布置。他还指示我去对从三个单位抽调的人员进入北师大之事做动员。我因下午还要到中宣部开会，就请他叫黄志刚去动员。下午我正在中宣部开会时，吴德急如星火地打来电话，让我立即回去，他在电话中说：“康老很有意见，请你快回来。”我一听知道事情大了，立即赶回市委，与吴德见面后话都没有说，立即上车赶到康生那里。到后，果然看到康生大发脾气，当时，薄一波也在场。康生主要是对处理北师大孙友渔的问题有意见，责怪北京市委没有执行他

的指示。他声色俱厉地对我和吴德说：“孙友渔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是为什么？我看孙友渔有后台，有后台！后台之后还有后台！”他的话很明确，明显地他把我也指责为是孙友渔的后台，而且还不止是我。我想他发那么大的火，说不定要拿我开刀。

我心里明白，康生为什么借孙友渔问题对我大动肝火，严加指责。因为在此之前，他还通过一些人转告我，曹轶欧从没有参加北大工作组。同时，还曾指示过我：“派工作组是错误的，都是刘少奇背着主席决定的，你要揭发刘少奇。”对此，我真是感到莫名地惊诧。我大惑不解康生为什么要如此说假话，曹轶欧明明在北大工作组里面，而且曾经要求当副组长，在我婉言回答后，还收到过她的信，信中说：“我不能做工作组副组长，请把我的名单从工作组撤掉。”倘若那次把曹轶欧安排上，她也不会要求退出。这件事使我发现，康生这个人竟然能随口说假话，就像陈伯达一样，他明明派了工作组，却说从来没有派过工作组。关于康生指示我就工作组问题揭发刘少奇，我心里也很明白，少奇同志是主张派工作组的，但他从来没有就派工作组问题对我有过什么直接指示。反之，我派工作组大都是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指示、催促、逼使的。我怎么能昧着良心去揭发刘少奇呢？

接着毛泽东又于7月24日、25日，先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又曾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先后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途，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组长的官。虽然事先康生曾指示我要在工作组问题上“揭发刘少奇”，但我在参加所有有关的会议上，在中央高层对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我没有说过一句对少奇同志不利的话。我心中也想过，这样做肯定会得罪康生，但做人总应有个起码的底线，绝不能为保护自己，就看风转舵，去嫁祸于人。康生会对我如何，只好听之由之！

也就是在此前后几天内，江青、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员们纷纷到北大、北师大等高校讲话。江青在北大万人会上声嘶力竭地喊：“要撤销工作组”“要罢张承先的官”。老奸巨猾的康生也跟着阴阳怪气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7月27日，康生对我的打击陷害也终于露出凶相。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突然阴险地说：“彭真搞了‘二月兵变’，人大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意思是我参与了“二月兵变”。这可以说是害人于死地的重型炮弹。果然由于康生的煽动，7月28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便跑到市委请愿示威，要求揪我回人大，扬言不把我交出来，就不回学校。我看到直至当晚8时“造反派”仍聚集在市委门口不停地高喊要人时，便找吴德谈话，主动要求回学校接受群众的质疑。吴德当即表示：“还是留在这里，不要回去。”但到了晚10时，吴德又找我来说：“与李雪峰同志商量，看形势你还是回人大吧！”他还要派军队护送我回校，我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随即通知我的秘书李春景同志乘车回校。从此我便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之中。

北京新市委在雷霆万钧般的压力下，于7月28日作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上宣布撤销我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当我听到对我撤职的决定时，甚感不解与莫可名状的苍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这样不明不白的处理，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听之忍之，但内心深处对康生、陈伯达在工作组问题上玩弄的两面派伎俩却有了深刻的了解。

我个人对于康生的认识和了解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原来总觉得他是老党员、老革命，又是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大理论家，对他一直是比较敬重的，常按党内流行的称呼尊之为“康老”。由于他长期主持党的宣传工作，还是中央理论小组的负责人，而我先后在南京大学、人民大学工作，因工作关系当然有所接触，也多少有点个人交往，他还曾送给我用左手写的书法。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我作为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有时需要请示他。还有时李雪峰叫到我那去汇报，他有什么意见，也让我转达李雪峰，相对说来接触多些。当时尚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问题还没有展开，当时并没觉察他那么坏，只是觉得他有些事做得不大对头，我并没有觉察到他有什么问题。但是7月28日我从市委被揪回人民大学，7月29日我被宣布撤职，遭受批判斗争之后，每当静下来时，常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

生的人和事进行思考，这其中我与康生的接触、谈话以及他对我的态度，是我思考较多的问题之一。从反复思考中，渐渐地理出了个头绪，我感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我似有一个从拉拢到打击、迫害的过程。其中有几次突出的谈话，可以看出事态的发展线索。

首先是1966年5月26日，也就是聂元梓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康生曾找我谈过话。谈话是从国务院外办发出的一个文件谈起的。他说昨天外办发文件允许外国人对大字报照相，这是错误的，容易泄密。为此，他又让外办最新起草一个文件，还为此打电话给北京市委和我。还说“李雪峰同志解决得好，内外有别嘛，这是原则”（指李雪峰5月25日晚就聂元梓大字报涉及问题在北大的谈话）。他还说：“北京市委是修正主义的市委，是大党阀。《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上就有嘛！把中央文件弄出来可以教育人。这是超出报纸上已有的范围，为什么不看《通知》，那才是躲在三家村死狗身上。是否有修正主义代理人，要等中央文件出来再说，现在不能说。”他又说：“北京市委、中宣部瘫痪了，我顾不得。你们（指北京新市委，当时尚未公布）要站稳立场，不要糊里糊涂。北大的隐患在后头，是要继续拥护宋硕大学部。学生不造反，我们就号召造反”，“要大闹天宫”，如此等等。他讲的这些话，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当时是语出惊人。因为有的大字报虽然矛头指向彭真和北京市委，但其点了宋硕、陆平和彭佩云的名字。即使是这样，也受到中央的批评和群众的反击。在毛泽东未对聂的大字报公开表态之前，许多人都还在观望。而康生则指出“大党阀”，“修正主义代理人”、“要号召造反”、“大闹天富”、“不要躲在三家村死狗身上”。还特别告诫我“不要糊里糊涂”，“要站稳立场”。这中间既有提醒，也有关照和希望，似乎都是对较亲近的人在私下里说的话。言外之意是对我较信任，希望我能旗帜鲜明地造彭真等人的反，要密切和他配合，明显有拉拢的意图。但我这个人在党内生活多年，比较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按组织原则办事。我在北京新市委工作，李雪峰是我的直接领导，我想凡属重大问题都应按李雪峰的指示去贯彻、去执行，既不越轨行事，也不在下面和人拉扯，不想赶浪潮、出风头。尽管康生在当时红得发紫，我也不愿意和他在工作之外有更多的个人接触。他在说话中涉及我个人的地方，我也就听听而已。此

后，我也一直秉持这样的原则而不主动向康生靠拢。这样的思想状态和工作表现，当然不会使康生满意。

其次是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李雪峰、吴德等新市委的领导都感到措手不及，当时进行了紧急研究。按有关批示，派出了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李雪峰和我当晚还到了北大。面对新的局面和形势，各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李雪峰心中有些无数。为此，他批示我和吴德在6月2日，去向康生汇报和请示，涉及的问题有：北大的问题、一般的面上的问题、市委机构的问题、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市委亮牌子的问题以及李雪峰上马的问题等。因为当时中央决定任命的北京新市委的领导班子还未公开宣布，运动的发展形势又很急促，许多问题都要以北京新市委的面目出现，不公布新的班子工作不方便。

那天我和吴德与康生见面说明来意后，康生先说了：“北大出事不出事，关键在党委。”随后，吴德请示：“一是解散北大党委，还是停止陆平的工作，或者把好的干部吸收到党委中来？二是对陆平行政上仍让他继续出面还是撤掉？”对此，康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对于北大的情况，你们都不太清楚，不妨详细说说。他说的很多，从1959年北戴河会议讲到1962年的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和北京市如何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大是陆平和彭真多年把持的据点。而且说彭真和陆平直到现在还在抗拒。聂的大字报广播后，他就接到抗议的电话59次，许多学生还被蒙蔽，误认为北大党委是执行了党的指示。因此工作组进去后，一定要旗帜鲜明，否则无法领导群众。还说周总理指示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结果使右派拿“内外有别”打击左派，陆平、彭珮云等也拿李雪峰讲的“内外有别”打击左派。言外之意，他认为“内外有别”的规定不一定妥当。接着他又明确说：“北大党委不能活动了，也不能让陆平主持会了，否则会得不到左派信任，也会使中间派模糊。工作组要旗帜鲜明，代替党委。中央任命李雪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新的市委面目要出现。原来想缓和一点儿，现在看来不行了。”正是在这次谈话后，6月3日，新华社就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的消息，中央决定任命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同时，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向北大派新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

在和康生的这次谈话中，引起我吃惊的是，和陈伯达6月1日晚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对张承先出任北大工作组组长感到不满一样，他也说：“干部的任用要全国考虑，张承先应先拿下来。我对他有点疑虑，他软一点，身体也不好。伯达同志的意见，要有名望的人去，要改组。”他虽然没有点我的名字，但我心中有数。他分明是表示对我的信任与好感，有意抬高我，套近乎，是有意拉拢。但当时，我和吴德对这番话都没有作任何反应。我由此想到，张承先出任北大工作组组长的事，很可能是由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和李雪峰等人商定的，并没有征求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意见。在毛泽东未对工作组问题作表态以前，他们也不反对派工作组，只是对工作组组长人选有不同看法，甚至要“把张承先拉下来”。这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虽然我没有按陈伯达、康生所说的去北大当工作组组长，但派工作组问题却成了我的罪状，我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与张承先的工作组长职务于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一起被撤销。

再次就是6月14日到6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大会前后。那次会上主要是陈伯达、姚文元谈如何开展大批判，如何批判周扬，布置写批判文章的事。在此期间，康生又找我谈过话。这次谈话的突出内容主要是人民大学的事情。他曾问我：“孙泱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他还不错，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做过朱老总的秘书，政治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都可以”。但康生却沉着脸说：“是这样吗？！”稍后又说：“这个人很坏，不能说做过朱老总的秘书就一定可信，你要注意。”我说：“我现在还没有觉察到他有什么事。”后来，也没有过多去注意孙泱有什么问题。但随着运动的发展，没想到戚本禹唆使人大的“造反派”在校内外贴出“打倒大军阀、大野心家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什么“揪朱德联络站”，到中南海去揪朱德。后来因毛泽东干预才停下来。但康生在上海和我的谈话“孙泱这个人很坏”说明，他们想通过孙泱反对朱老总，是早就有预谋

的。他就此向我早透底交代，似乎也是拉我参与其间，但我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想到他们背后的阴谋，当然更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暗示人民大学搞孙决的问题。后来，戚本禹到人民大学宣布，孙决是人大的第一号敌人，我是人大的第二号敌人。这说明不和他们同流合污都要被他们打倒。

接着就是7月18日以后，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江青、康生、陈伯达曾在几次会上，就应不应该派工作组，要不要撤工作组等问题上，与刘少奇、邓小平公开发生争论。这时康生曾一再向我表明，曹轶欧从来没有参加工作组；同时要我在最高层的会议上，当面揭发刘少奇指派工作组的问题。我以沉默不语表示抵制。至于曹轶欧是否参加了工作组，就更不能瞪眼说瞎话。一度在社会上有人贴了康生的大字报，有人找我调查曹轶欧的情况时，我也就事论事，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有一次一个调查的人对我说，康老反复强调，曹轶欧没有参加过工作组，我想他们是想让我做假证明。我一没有按他们指示揭发刘少奇，二没有证明曹轶欧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组，自然都使康生大为失望，必然对我恼火，引起忌恨。

此后，因为对工作组应如何评价、应不应该撤销等问题上，北京新市委和康生等人的意见直接发生分歧。特别是康生明确指示要罢孙友渔的官，北京新市委却没有按他的指示做。为此，他把我和吴德叫到他那里去，对我们大动肝火，大加训斥，说：“孙友渔有后台，有后台，后台之后还有后台！”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和我撕破脸皮的一次谈话，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和颜悦色的拉拢了。我已意识到，他很可能要对我开刀，进行打击陷害了。

果然，在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康生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我认为康生在讲这话时，他自己也知道并无根据，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需要，便毫不负责

地对彭真栽赃陷害，捏造他搞了什么“二月兵变”。同时，他似乎是随意地说：“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实际上则是别有用心地要把我端出来。

关于“二月兵变”一事，我和康生在此之前就有过对质，我已向他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早在1966年6月上中旬，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师大相继就“二月兵变”贴出过《郭影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我知悉有这样的的大字报后，一笑置之，根本不当成什么事。不料，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上，康生突然向我发问：“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大字报我虽未看过，但我知道这件事。”康生又进一步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汇报？”我又说，“我认为大字报揭发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事，所以没有汇报。”当时，康生冷笑着“嗯”了一声，随手从包里拿出个材料给我看，原来是他的联络员给他写的一个汇报。材料中说：北大某某大字报揭发北大、人大都曾有过驻军，是要搞兵变。康生用红铅笔在材料上画了大杠杠，还指着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为此，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与原委向他说明。现在看来，他问我“为什么不汇报。”，更主要的目的，是想让我跟他一起捕风捉影，据此揭发彭真。但我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又怎么能据此汇报、揭发呢？

这件事本来是很清楚的，1966年初我正在苏家坨搞“四清”时，北京卫戍区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借过房子。据来人说是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向他们介绍说，海淀区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在学校的同志表示可以安排些房子暂时借用。学校的同志也向我汇报过此事。但是，后来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同志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决定不在学校租房，而住到郊区的一个靶场。从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看，怎么能得出是彭真想搞兵变的结论呢？不料，康生却未由此善罢甘休，他终于于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讲出了那番耸人听闻的话。这不明明是凭空捏造，有意栽赃陷害，且趁机打我一耙吗？！

康生讲了所谓的“二月兵变”的第二天晚上一7月28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就兴师动众到市委把我揪回人大。这说明，我在未经任何正式组织手续的情况下，被“造反派”揪回学校，其直接导火线就是由康生捏造的“二月兵变”，并无中生有地指控我“也完全知道”。

后来，又是在康生等人的煽动下，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叛徒斗争高潮。1967年3月和4月间，康生在一次群众会上，信誓旦旦地说：“郭影秋是叛徒，现在已有确凿的证据。”这又是进一步的栽赃陷害，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康生对我从拉拢到打击陷害的过程，终于使我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联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两面派，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

被关押期间的非人折磨

康生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诬陷我“完全知道”“二月兵变”之后，第二天夜晚我被人大的“造反派”揪回学校时即遭到拳打脚踢，随后又被拉到批斗大会上，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连续批斗长达四个小时之久。被批斗完之后，又被拉到一间学生宿舍中，手脚都被捆绑起来，完全像一个罪犯囚徒。从此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受的蹂躏折磨，真可谓九死一生。

当晚的批判斗争大会之后，把我关进法律系的学生宿舍。到那房子里去时还是被捆着的，一点也不能动。不久，农经系的学生跑到法律系那里去找关押我的人说：“你们把门打开，郭影秋作为批斗对象，不光是你们的，我们也有权批判。”这样他们把门打开了，我也被松了绑，住到农经系学生宿舍。第二天，管我的农经系学生说：“可以释放你了，你愿意到哪里住都可以，也可以回家”。我想我还是置身群众中吧，就还住在东风楼。

一开始，在人民大学的师生员工中，对我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相当多数的人是持

肯定和“保”的观点；另有一部分则是主张打倒的。在这后部分人中有少数干部和教师，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学生。两派之间越争论，反对者对我的斗争和折磨也越加激烈。1966年8月2日在全校关于我的问题的辩论大会上，小平同志发表了对我带有保护性的讲话：

“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

到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不很了解，但是，大家可以和他的前任比较一下，是否有进步和变化呢？”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对小平同志的批判诽谤越来越升级，他日益处于自身难保的处境。他对我那些保护性的讲话，反而成为“造反派”把我看做是“刘邓司令部的人”的把柄。将我的问题和“刘邓路线”联系起来，使我的问题步步升级。

接连的批判斗争，使我的精力有所不支。本来在北京新市委工作阶段，我就非常紧张和劳累，回校后经连续斗争，不久终于生了病。吴老知道后，用他的车把我送进友谊医院，一方面是看病，一方面也是想保护我。吴老还亲自爬到楼上病房来看我，他一见我就流了泪。当我把自己到人大后的情况向他简单汇报，我说来人大后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发现学校的人有对立情绪，我是如何向中宣部和市委报告、怎么处理的等等。吴老听了后说：“你用心良苦。”我从友谊医院出院后，吴老又设法把我送到颐和园西南角湖水中间的一座有藻鉴堂遗址的小岛上保护起来。住了一个时期，实在保护不了了，“造反派”甚至要揪斗吴老，我只好回学校，继续接受批判斗争。斗争之余，就在校内进行劳动，在煤厂劈木柴，同时随叫随到，被勒令交代问题。吴老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包括我受迫害在内的一些事非常气愤，积郁成疾，于1966年12月去世，我也失去了最可依赖的保护人。

因为我在农村“四清”时，和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感情，他们对我留下了好的印象，1966年8月和9月，苏家坨的农民知道我被打成“走资派”遭受批判斗争而不理解，自发成群结队地到学校来，表明对我的看法，还与“造反派”辩论，甚至发生争执。这就是六百名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事件。对此，我事先毫不知情。“造反派”却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诬陷我：调动农民保自己、挑动群众斗争群众，并捏造材料，上告中央。当时，全国其他城市也发生有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现象，以至于引起毛泽东重视。他9月7日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近来，长沙、西安等地，都有工农围攻学生的事件发生”，而且提到在北京也有中国人民大学调动六百名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为此，中共中央即发了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就此发了社论。此后，“造反派”以我“挑动农民斗学生”为罪名，连续召开质问、批判、斗争大会，把对我的批判斗争推向一个新高潮。我稍有申辩、说明，就被指责为对抗、反对“最高指示”、“罪该万死”。

到了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全国上下都在批判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上挂下连，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联合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把我作为在北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斗争。在这次批斗大会后，在人大校园内，对我的批判斗争会接连不断，有时一天竟连续开好几场。

1967年2月，在中央有关报刊上，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社论，在中央工作的一些老师老将不顾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淫威，在怀仁堂仗义执言，痛斥这伙人迫害革命老干部，反党乱军，破坏国民经济的罪行。这本来是大快人心事，不料那一伙败类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无耻手段，反咬一口，到毛泽东主席那里诬蔑这些老师老将反对“文化大革命”，搞“二月逆流”。在全国又掀起一阵反击“二月逆流”，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在此前，由于人民大学的师生经过一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践，重新发表过一些对我持肯定态度的观点，现在又被诬指成人民大学搞“二月逆流”和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和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关联，我却被说成是“二月逆流”的代表，又是接二连三的轮番批判、斗争、游街示众。

特别是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窜到人民大学，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人民大学的敌人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而康生又在一次群众会上，信誓旦旦地说：“郭影秋是叛徒，现在已有确凿的证据。”我一下子成了“铁定的”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假党员、走资派和全校二号“敌人”。随之而来的是更惨酷的斗争和打击，我被关押在“造反派”总部的地下室里，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批判斗争不分白天黑夜，随意审问。他们有时还大搞疲劳战术，连续十几个小时质问斗争，甚至还煞有介事地举办“审判法庭”，弄一些假证据，强迫你承认，甚至扬言：“你不承认，也可以宣判，可以开除你的党籍。”

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揪叛徒、抓特务，是真的要置人于死地了！但是，说我是叛徒、特务、国民党，总得要有证据。而他们拿出来的证据，有的简直荒唐可笑，有的就是栽赃陷害。在我被拘留期间，有许多很奇怪的事。比如有次礼拜天，突然有两个徐州人跑来，让我谈与白占夫的关系，并说你们在国民党中央局共过事，你们有很多事，他都交代了，您也该交代呀！我说白占夫这个人，我只听过他的名字，我与他并不熟悉，他是个运动员，经常在运动场上跑，我知道他，但并不熟悉。看守的两个“造反派”学生说，这么大的事，你们应该通过我们总部，由总部来谈。你们不要直接来谈。那两个人恼火了，说，这都是你们给我们讲的，你们去徐州的人讲的。你们要不去人说，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中统特务呀！这个事透露了一个消息：许多材料不是当地查出来的，而是北京的人编造了这些谣言，散布出去，使外面信以为真。另外兰州有个人到我们学校的国际政治系调查，硬说我说过邓拓的《燕山夜话》手稿我看过，我修改过。我说我不认识邓拓，他的《燕山夜话》出版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我怎么能修改他的稿子呢？他们说：“这是你们第六兵团亲自对我们讲的。说你是亲眼看了这个手稿并修改的。你抵赖什么？”我说：“我不抵赖。我没有这件事。”这又是造假。

另外有一次夜里开庭审讯，里面有法律系的教师，我不认识。说我是真国民党，开头拿出证据让我自己念。我就把证据自己念了。证据是我在师范的一个老同学写的，他叫王

广德，徐州的，他是高年级，我是低年级。现在他是劳改犯。他写的一个材料中说：在铜山师范有个国民党区党部，他是区党部的组织委员，下设几个区分部，区分部都有支部书记，其中之一就有郭影秋。这个材料是他亲自写的，并且经公安局盖章。我念到这里时，他们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根本没有这件事。他们说：“这有人亲笔写的字，而且盖着公安局的红印。你怎么说没有这件事呢？”我说：“红印可以随便盖的。我没有这件事！”他们说：“你是真国民党，我们决定开除你的党籍。”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只有党组织才能开除。没有听说一个群众组织可以开除党员。”他们说这件事情很大，是交专门机关处理，还是交给军事法庭处理。我说那都一样。他们拍桌子大骂，我理也不理。后来把我押下去，还增加双倍的人看守。这个问题就那么悬着了。后来军宣队进校后，派了联合调查组，又到徐州调查，找到提供材料的人，他说他记错了，郭是学生会主席，伙食委员会主席，不是区分部的。这样才把那旧材料否定了。他们外面造了假，然后依赖这个线索向你硬栽。来的人向你对证，把假的当做既定事实，让你签字盖章定案。运动中有过好几次这样的事。让我签字盖章，我说我不能签。为此，发生过很大的争执，我说我不能签字。后来要我的图章，要盖图章。我说没有。

这段时期有的人所用的手段，比湘西“肃托”还要狡猾。因为湘西“肃托”时打人、杀人都是公开的。那时打人就是在大白天，捆起来吊打。被杀者如果是大干部，还要张贴布告。而这时，却都是在背地里做许多事，你看不见。常常是捕风捉影硬栽。有人告诉我，人大的“造反派”到徐州去，找到1936年保我出狱的赵光涛先生，逼他证明郭影秋是叛徒。赵万般无奈，写了材料。交材料时他对红卫兵说了一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回去后不两天，他就自杀了。我联想到湘西“肃托”，那时先是逼、供、信而后杀，现在只缺一个杀。现在用阴狠的手段比之那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无法无天的批判斗争持续了好几年。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有时开质问会时，“造反派”坐在对面桌子旁，前面与你谈话，下面不时用皮鞋踢你的腿，直踢得腿上流血。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

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等。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一个人，大打出手。我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子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在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下午就有几个人来问我，他们假惺惺说“你怎么啦？有人打你了吗？打你了应该给我们说。他们打你，我们看看有没有伤。”还找了医生，装模作样看一看，看了以后说：“没有事。”都是他们自己的医生。我的脸部有半面黑了四个月，都是打的。

在批判斗争中，对人肆意折磨蹂躏，进行人格侮辱，尤其使人难受。折磨蹂躏手段，花样百出，竟至无聊无耻，让人难以启齿。如游斗时，他们事先唆使些不懂事的孩子，往你脸上抹稀泥，然后再拉着你在路上跑，身上还挂着大牌子，一边跑，一边斗，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让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这时，又让一群孩子，围着嬉笑辱骂，再往身上抹粪便，把人折磨蹂躏得不成样子。更为阴险毒辣的是，他们还故意给你创造条件，诱导你自杀。譬如有时晚上，看守我的人全部都去看戏。临走前，把门从外面锁上，屋里放着斧头、砍刀，绳子、通条，什么都有，我想这是干什么呀！我怎能上他们的这种圈套，怎能不明不白地去死呢。这种阴险手段反而使我更加坚强，我心中只有义愤。

有一次，我的妻子凌静带着孩子来看我。她不知怎么设法进来的，因为对我管守得很严，但到了关我的房间，门却被反锁着，她进不了门来，就在门外说，你开门，我和你说几句话。我说：“外面锁着门，我没法开”。她就外面生气地说：“这是干什么呀！还不如国民党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还可以探视，现在连见一面都不行，连孩子也不能见。”

我就告诉她和孩子：“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有意外的事。”

到了1967年的冬天，我的左腿疼痛不止，还不断流血化脓，“造反派”不得不送我到医院看病。在医院里也不得安宁，住在一个大病房里，作为“黑帮”，还得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质问，还要“劳动改造”。那次住院是1967年9月。住了三个月，我自己要求出院，医生问我为什么要求出院，我说：“学校有运动，我应该在运动中解决自己的问题，老在医院里住不行。”但是，回到学校后，每天质问、批判、斗争又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在连续批判斗争后，我不行了，躺了两天，医生给我打针时，一试体温40.7度，大夫吃惊地说：“你怎么还躺在这里呀，体温这样高，不得了。”后来不得不又把我送进医院。

在遭受批判斗争的过程中，也使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绝大部分学校的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还是理性的。他们有时不能不随大流，在对我们这些“走资派”的批判斗争中，随众人一起，参加会议，进行些批判。有些学校的中层干部，也不得揭发些工作中的问题，否则就被认为是“保守派”，不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等等。大多数年轻学生，年轻幼稚，要紧跟毛主席积极革命。也有些人受极左思潮影响，分不清是非，一时盲动，动手打人，搞些恶作剧等。但他们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成熟，早晚会对自己的打人、骂人行为感到悔恨。但确也有极少数随手打人、随口骂人、心地很坏的人，属品质问题。法律系有个学生叫白云飞，我觉得就是这种人。他是法律系军人班的，不像一般青年学生，有些老道，阴险毒辣，诡计多端。就是他给我开所谓特别审判法庭，逼供讯，硬逼我交代是叛徒，是特务，而且说我本人不承认也可作结论，“交军事法庭，开除你的党籍”等。即使我在住院时，他还继续带人跑到医院斗争我、折磨我。他很有手腕，很有心计。我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干什么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那么多坏事，也不知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所悔悟，是否已经懂得羞耻、痛改前非？否则再有什么风吹草动，他还会兴风作浪，搞什么鬼名堂，对这种人应有所警惕。

在人民大学的教师干部中，我知道很多同志对我持同情态度，暗中给以保护。但也有个别人，心地不那么善良，甚至赤膊上阵，对我进行诬蔑栽赃陷害。譬如党委宣传部的某

人，在一次批斗会上，说：“我可抓住了你的黑手啦！”但是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事情是我给彭真写过一封信，关于我们在湖南的“四清”工作队究竟让谁领队的问题。当时孙洪、赵德芳（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在山西，我就提名湖南的领队为张腾霄和铁华。因为他们两个是对立面，让哪一个人作领队都不好，所以便让他们俩一起做领队，便于平衡关系。但有人反映，说张腾霄赞成“合二而一”。事情是《光明日报》传出来的，我就叫此人到报社去了解一下。他调查后，给我写了个材料。材料并不能落实张究竟是否主张“合二而一”。为此，我给彭真写了封信，说明事情的原委，报告说张腾霄还可以领队。而当时做调查的此人就以此为据，说：“你的黑手被抓住了”，据此证明我与彭真有黑关系；还据此说我包庇张腾霄，斗争很厉害。教师、干部里站出来批斗我的就是这个人等少数几个人。

我本来是一个农家子弟，又打过游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曾带兵打仗。新中国成立后在党政部门和教育战线工作时，仍坚持锻炼，常打网球，体质本来很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时期遭受批判斗争，折磨蹂躏，健康的体格逐渐垮下来。加上在有病时，又得不到及时治疗，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因病长期住院，最后不得不锯去一条腿，弄得终身致残，确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折磨，患病拖延不治及误诊、误治有一定关系。

到了1969年7月，我的身体状况终于到了危重阶段，日坛医院诊断为癌症，全身疼痛，大便出血，有进一步恶化趋势。这些情况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他通过当时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向人民大学询问我的情况后指示：人都病到这样了，还是先治病要紧。经过这样的干预，驻中国人民大学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才提出“先解放，以后继续进行批判”的意见，于1969年10月7日召开了全校人员参加的“批判、解放郭影秋的大会”，并作出“审查结论”。结论说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群众运动”，还说我对“错误有深刻认识”。“同时，对郭影秋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审查，现已查清，郭影秋历史清楚，不是叛徒，不是特务，过去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虽然“在学校工作期间和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错误性质严重，但还不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犯错误的好人”，“同意给予解放”，“但对他的错误将继续背靠背地进行批判”，不过“为了方便治病，不再办学习班”。这样才结束了无休无止的批判斗争，能够较好地治病了。

现在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不堪回首的遭遇和经历，为的是不忘这段历史。我坚信，从这场噩梦与浩劫中走过来的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一定会从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再也不能让这种历史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人民大学是怎么被撤销的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适应革命和建设急需人才而建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均作出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3日举行开学典礼时，刘少奇、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党和政府领导人都出席了。少奇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办起来的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是没有的。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例子来办其他的大学”。可见人民大学在党和人民政府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人民大学自1950年成立以来，为我们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和贡献。虽然其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有时也走过些弯路，如建校初期全盘学习苏联有些教条主义，后来在政治运动中也有扩大化的错误，但就其主导面来说成绩则是主要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它已逐渐成为一所新型的、独具特色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被中央列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校之一，在教育领域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这样一所好端端的著名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迫停办直至被正式撤销，作为学校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对这样的决定大惑不解和深感痛心。尽管在停办、撤销过程中，我还没有重新恢复工作，且在病中，但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出过反对撤销的意见。当回天无力时，又对如何保存学校有生力量提出过建议。

人民大学究竟怎么被撤销的？对此，在一些同志的讲话或文章中，往往把它说成是“四

人帮’的干扰破坏”，“‘四人帮’的勒令强迫”，等等。总的讲，这样说也不为错，但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样的说法有些简单化。我认为有必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具体考察，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我曾经仔细回顾过人民大学被撤销的过程。

凡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动，最初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是以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为切入点的，而后再是顺藤摸瓜揭露这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支持者和包庇者，就是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而，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各个高等学校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黑窝点”，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钱的黑阵地”。很快，各个高校的领导人都无一幸免地被打成“黑帮”或“反动权威”，学校的教师也被打成“修正主义教育领域的吹鼓手”，当时的普遍舆论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学校与教师可谓斯文扫地，毫无尊严。

从1968年初开始，各个省市纷纷建立了“造反派”夺权的革命委员会，各个学校的文革也进入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农民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这段著名的“最高指示”成为当时各个学校进行斗、批、改的指导思想。继“七二一指示”之后，毛泽东又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随之，向各高校派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8月中旬也进驻人民大学。

我后来知道驻人大宣传队指挥部早在1969年初就对人民大学是否还要办召开过座谈

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学校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老师和职工代表。这次座谈会后还印有《情况简报》，《简报》开头就说座谈会是“根据北京市革委会指示”召开的。北京市革委会既然指示开这样的座谈会，显然有其意向。有人还向我介绍，参加座谈会中的多数人都认为人民大学没有必要办，持这种主张的主要理由是：学校原有专业设置与其他院校重复；有些专业如档案、会计、新闻、法律，根本没有在大学办的必要，办个训练班，培养几个月就行了；文科不能脱离实际，应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去培养。

今天看来，人民大学本身的教师和干部竟然主张“人民大学没有必要再办”，所持理由似乎荒诞不可理解。但如置身当时的时代就一点不奇怪。因为毛主席说的“大学还是要办”主要是指理工科而言，自然可以理解为文科大学可办可不办。持这种主张的同志或者是由衷之言，或者是在当时形势下的违心之论，但无疑都是学习领会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结果。包括所谓“培养一个会计用不着上大学，只要训练几个月就行了”的看法，因为“七二一指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嘛。

当然，座谈会上也有少部分同志认为人民大学还有必要办。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国家大，国际任务重，还有国际培养任务，需要一批水平较高的人从事政治、经济理论工作，因此需要一所培养这种人才的学校。而且，文科大学还是要办一点，人民大学可以单独办，也可以与其他院校合办，但至少保留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理论课程。

应该说在当时形势下，能主张“人民大学还有必要办”的意见和想法已是难能可贵。不过，却不能成为主流意见。

值得注意的驻校宣传队指挥部有明确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没有必要单独办，从现有12个系的专业来看，多数与其他大学重复，可以由上级领导机关统一调整合并。总的倾向是不再办。”应该说驻校宣传队指挥部的这种意见，对人民大学的停办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意见可以直接影响北京市委的决定。恰巧在1969年10月，教育部又通知：中国人民大学由原教育部领导下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领导。领导体制的这种改变，使北京市革委会就可以决定人民大学的命运。

果然，1969年10月，北京市革委会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事实上在停办的通知正式下达前，人大函授学院设在天津及太原函授站的房屋、家具及办公用品，就已由驻校宣传队作主，转交给当地。学校在北戴河的休养所的房产、家具则已全部移交至北京市革委会。而且，当时学校的教职员工因“一号命令”和“五七指示”，大部分都到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整个学校已是人去楼空。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在当年迁入人民大学校舍。这些情况说明，在人民大学停办的通知下达之前，有关方面就已有停办人民大学的决定性意向。

继之在1971年1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关于高等学校调整问题的座谈会上，写出了《关于高等学校调整问题的报告》，按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精神，提出了几条调整原则，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综合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人民大学即被列入撤销的院校名单之中。同年4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教育工作，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同时认为学校的原有教师队伍当中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是有名的“两个估计”。国务院科教组原来提出的《关于高等学校调整问题的报告》，将全国原有的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销45所，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调整报告》作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附件报送党中央，经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全国，人民大学的撤销成了不争的事实。

从回顾人民大学被撤销的过程中，我想大家可以得出结论，人民大学的撤销，固然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干扰破坏有关，但这并非是“四人帮”等干扰破坏的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它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想下极左路线的产物，也是当时彻底否定17年教育工作的一个必然结果。

我虽然是文化大革命前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但对于1969年1月驻校工、军宣队指挥部就人民大学是否继续办召开的座谈会及其《简报》在当时并不知情，因为当

时我尚处在被审查、被批斗之中。上面所说的情况，都是后来在与吴德的交谈中才知道的。1969年7月，在周总理干预下我被“解放”，行动有了相对的自由。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吴德同志曾不时看望慰问我。在市革委会酝酿停办、撤销人大的过程中，吴德也曾两次向我打招呼，听取我的意见，做我的思想工作。第一次1969年10月作出停办人民大学的决定前期，他向我通报了工、军宣队召开座谈会的情况和他们的意见，我当时即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停办的意见。我再三说明学校的革命历史传统，强调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直接创办的一所新型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学校的干部和教师大多来自革命老区，经受过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又掌握了系统的专业知识，还有一大批青年教师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大多数干部教师都是好的。虽然这些年学校“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家都有了认识，今后还可以继续改造和提高，还是能担负党和国家交付的任务的。我还强调专业设置重复不能作为停办人大的理由，拆散容易，聚集很难，不要只看眼前，还要从长远着想，请吴德等北京市革委会领导作决定时要慎之又慎。尽管吴德表示可以向上面转述我的意见，但我看出来他自己也有些无可奈何，也就知道我的意见不可能有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在此之后的1970年春节，学校的王俊义和郑杭生同志从江西干校回京探亲来看我时，我曾以沉重的心情对他们说：“看来人民大学要被停办已无可挽回，你们都还年轻，既要在顺境中成长，也要能在逆境中经受锻炼和发展。希望你们再回干校以后，能在艰苦的环境中付出更大的努力。要认真读书，多思考问题，在可能情况下能写一点有分量的文章，以使中央和有关方面看到中国人民大学这支队伍不可低估。”这些话多少反映了我当时我的看法和心情。

在人民大学的撤销已成定局时，我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1971年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内蒙古大学校长于北辰同志在会议间隙来看望，向我转达人民大学将被正式撤销的情况。当时我就向他说这件事还值得研究，并向他说明人民大学的历史沿革、师资力量，图书资料丰厚（278万册），基础较好，聚集不易，散掉可惜，而且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好的，是能够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全国四百多所高等学校的政治

理论教师，大多是人大的毕业生、进修生。我们八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保留三百多所高等学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人大这样一所高等学校。于北辰同志遂于1971年7月26日正式写信给当时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和副组长迟群，反映了我的意见。信中说：“前几天我去看望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同志，谈到人大撤销问题”如何如何。但这样的意见和反映已不可能被当时的领导所采纳。

人民大学撤销了，而学校的教职员如何安置呢？吴德同志曾向我说过，北京市革委会在1970年6月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对此提出的意见是：人民大学的教职员2313人，已有2/3去该校在江西余江县的“五七”干校。撤销后，在京的教职员全部去江西进行劳动锻炼，并将该校党政关系移交江西省。我当时感到人员安置涉及许多实际问题，是件复杂的事情。北京市革委会的意见，是不是想用包袱？要把人大这两千多教职工包括家属都交给江西，在江西就地分配和安置，会有很多实际困难，应该对人大的教职工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但吴德同志说，这样的意见已经报中央了。

我还知道，对于人民大学教职工的安置问题，当时就有人写信向国务院科教组反映，不料科教组有人批复说：“来信意见，不必向上反映，可按一般人民来信处理。至于如何合理使用原人大的师资力量则是应另行考虑的问题。”可见他们关于人员安置是漠然对待的。当人民大学的绝大部分教职员都到江西干校之后，学校的领导工作中心也转移到那里，还成立了五七干校临时党委和革命领导小组，学校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崔耀先任临时党委书记和领导小组组长。当他按北京市革委会的意见，向江西省委、省革委会研究磋商人大的教职员如何在江西分配安置时，江西方面感到人大的教职员中老干部多、党员多，大都资历老、级别高、工资多，人员数目也大，在一个省范围内难以消化安排。崔耀先当然知道人大的广大教师和干部也不愿意留在江西，都有强烈的返回北京分配工作的愿望。既然江西方面表示难以消化，崔耀先同志也就因势利导，向北京市及有关领导单位反映了这些情况和意见。那时，因林彪垮台，形势有些变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批准了人大干部教师回北京分配的意见，同时通知撤销了人民大学在江西的五七干校。这样一来，在

江西的全部教工和家属才终于返回北京。

人大的教职工回到北京后，来看我的人很多，他们大都在这个学校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十多年，面对学校的撤销，自然有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他们都向我诉说内心的郁闷与今后何去何从的惶惑。我十分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与他们的内心都是相通的。鉴于我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与党内生活的经历，我一直在思考，像人大这样的学校，它的专业设置，干部和教师的政治、业务素质，难道党和国家今后就不需要了吗？客观环境和政治气候都常有变化，日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大说不定还能恢复，再办一个类似人大这样的学校也是完全可能的。在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面临再分配的情况下，如何保存和积蓄这批力量，如何避免这支队伍被零散地分配掉，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经过反复思索，和许多同志研究，逐渐形成了将学校的干部教师 and 各类工作人员按建制、成条块进行分配的设想。我主动请求与吴德同志交谈，向他说了这样的设想，再与学校其他领导共同研究，将这些建议写成了文字建议和报告。幸好这样的建议和报告被上级领导单位同意，1973年人大原有的教职员便得以按原建制、原单位为条块，分配到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单位，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及北京市委等。这样的分配办法，就为人民大学日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封面】

枯木之眼

以本期“编者的话”为题，拾山林之枯木，手绘眼形图案。

以枯木象征生命之衰老与死亡，以一眸赋之以魂灵。

春秋代序，草木枯荣；目为心扉，精神葱茏。■

——邹行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行